

博学文库

中组部推荐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第二辑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rxism Classic Works Reading Series



《神圣家族》 导 读

宋永平 刘晓勇◎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第二辑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kesi Zhuyi Jingdian Zhuzuo Dao du Congshu

《神圣家族》 导 读

宋永平 刘晓勇◎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圣家族》导读 / 宋永平, 刘晓勇编著. --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 艾四林总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5162-1409-1

. 神... . 宋... 刘... . 《神圣家族》
- 马恩著作研究 . A8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807 号

图书出品人 / 刘海涛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胡百涛

书名 / 《神圣家族》导读

作者 / 宋永平 刘晓勇 编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12

字数 / 135 千字

版本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409-1

定价 / 28.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总序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经典著作的大众学习。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大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有鉴于此，我们特邀一批高校、科研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十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起到积极探索的作用。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第一辑十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青睐，在2015年第二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评为优秀教材。这次推出第二辑十种，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扩展。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艾四林

2017年1月5日

目录

—• CONTENTS •—

总序 /1

第一章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及其成书过程 /001

一、《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 /002

二、《神圣家族》的成书过程 /010

三、《〈神圣家族〉导读》结构说明 /013

第二章 《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及其理论要旨 /015

一、《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 /016

二、《神圣家族》的理论要旨 /021

第三章 吹响批判的号角 /037

第四章 下凡的订书匠 /041

第五章 “儿子生父亲”的颠倒历史观 /043

第六章 掌控历史的批判哲学 /047

第七章 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大出其丑的埃德加爾 /051

一、批驳埃德加爾对工人阶级社会作用的蔑视 /052

- 二、批判埃德加尔在娼妓问题上的错误 /053
- 三、批判埃德加尔关于爱情的观点 /054
- 四、批判埃德加尔对蒲鲁东的曲解和攻击 /055

第八章 揭露“批判的批判”的秘密 /069

- 引子：“秘密”以及“秘密”的秘密 /070
- 一、“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 /073
- 二、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秘密 /074
- 三、上流社会的秘密 /078
- 四、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082
- 五、偷窥者皮普勒太太的秘密 /084
- 六、“斑鸠”——丽果莱特的秘密 /086
- 七、“巴黎的秘密”当中蕴含的世界秩序 /088

第九章 布鲁诺对群众的“三次征讨” /091

- 一、布鲁诺对群众的第一次征讨 /092
- 二、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098
- 三、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102

第十章 批判哲学及其记者自导自演的滑稽剧 /119

- 一、批判哲学及其记者自娱自乐的可笑戏剧 /120
- 二、批判批判哲学对群众的蔑视和攻击 /123
- 三、分析批判哲学脱离现实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及原因 /127

第十一章 揭露“批判的批判”的代理人鲁道夫的秘密 /131

- 引子：批判哲学的代言人——鲁道夫 /132
- 一、刺客转变成“狗”的秘密 /133
- 二、玛丽花皈依宗教的秘密 /135

- 三、法纪理论和道德教化的秘密 /140
- 四、“观点”的秘密 /146
- 五、慈善的秘密 /150
- 六、妇女解放的秘密 /152
- 七、政治经济学的秘密 /154
- 八、作为批判哲学代言人的鲁道夫的秘密 /157

第十二章 末日的审判 /161

第十三章 批判哲学的灭亡 /163

第十四章 《神圣家族》的理论意义及现实影响 /165

- 一、《神圣家族》是理解《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键性中介著作 /168
- 二、《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和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172
- 三、重读《神圣家族》的现实意义 /180

后记 /183

第一章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及其成书过程

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初次遇到《神圣家族》这本书，也许自然而然会联想起文学或者戏剧作品，而不会想到它是一部艰深晦涩的论战性理论著作。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合作撰写的论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即便它的内容让人望而生畏，但其重要性却又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一 |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

《神圣家族》的全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该书由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1月写于法国巴黎，1845年2月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出版，署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一）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文本

《神圣家族》的正式写作虽然始于1844年9月，但书中思想的酝酿较早就开始了。《神圣家族》与马克思此前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后来与恩格斯二度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共同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

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宣布过要对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而在之后与恩格斯二度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又更明确地继续延伸了对《神圣家族》中“批判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可见，这三部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其理论要旨可谓异曲同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以及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信徒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转变的曲折历程，一步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面貌。

诡异的是，《神圣家族》这部写成不久就出版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和受到关注的程度，远没有早已写成却拖至 1932 年才问世的另外两部著作（即《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广泛和热烈。同样地，在对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诸如中学毕业时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文章、《德法年鉴》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著作和文章。毋庸讳言，这些著作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但研究者对同样重要的《神圣家族》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研读和宣传却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神圣家族》出版较早，已经变得“不那么新鲜了”吗？难道是因为这部具有过渡性质的文本不具备鲜明和成熟的理论特征吗？抑或是因为它太难读懂而被研究者有意回避？

关于《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新世界观的第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34 页。

步是从《神圣家族》跨出的，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神圣家族》的重要理论意义。

既然《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又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结合起来，探索一下这本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要旨。

（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要谈这部著作的写作缘由，还得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那时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背景。

众所周知，博士毕业后，马克思获得一份《莱茵报》撰稿人和编辑的差事，后来又成为这份报纸的主编。由于马克思所主编的《莱茵报》对普鲁士国家的反人民性和腐朽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尤其是马克思为备受穷困的摩索尔农民再三辩护，尖锐地批评了普鲁士国家对这些穷苦民众所采取的暴虐政策，深深刺痛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因此，普鲁士政府决定从1843年3月3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莱茵报》被禁，使马克思失去了发表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阵地。他刚开始的反对旧制度的战斗遭到了第一次重创。然而，马克思是一位打不倒的战士。这种重创，不仅没有吓倒马克思，相反更激起了马克思的斗志。在被迫离开《莱茵报》之前，马克思于1843年3月18日在该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1]马克思勇士的形象跃然纸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虽然《莱茵报》被查封，但是，主编《莱茵报》的经历和一系列活动，使得马克思在短短的时间内，丰富了如下一些重要经验：一是他已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物质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二是通过为群众的利益进行斗争，马克思明白了以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武器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有适合无产者自己的理论来武装他们。这些经验促使马克思对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进一步认清了普鲁士国家的残暴和野蛮，看到了它的衰败和腐朽，也看清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它面对封建反动政府时的曲意逢迎和委曲求全，马克思对此感到十分厌倦。^[1]同时，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经历，马克思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许多认识存在着谬误和片面性，必须用新的思想来取而代之。而首要的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及其政治变种即国家学说进行批判，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马克思自身早期唯心主义思想某种程度的清算。

离开《莱茵报》的马克思又一次成为一名失业的知识分子。在郁闷中他想到了结婚，因为他已经和他的心上人燕妮相爱了七年之久。这七年，忙于反抗旧制度的马克思顾不上儿女情长，因此他们聚少离多，主要以书信方式互诉衷肠。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在他撰写的《马克思传》一书中，是如此评述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的：“对于卡尔来说，燕妮既是他所深爱的妻子，又是对儿女关怀备至的慈母；既是可靠的秘书和书信代笔者，又是富于智慧的顾问和尽善尽美的战友。自从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有无数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忠实地同自己的丈夫并肩战斗，无畏、乐观、无私和可靠，对社会主

[1][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第42页。

义的胜利充满信心，马克思夫人就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光辉榜样。”^[1] 这印证了一个俗语，任何一个伟人的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幸运的。

当然，马克思也渴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心系穷苦大众的马克思，更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公开且自由发表个人哲学见解、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环境和平台，而在德国显然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马克思深深感到：“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2]

他想到了去巴黎。促使马克思作出去巴黎的决定的因素很多，但是有一个人物至关重要，那就是当时还是马克思朋友的阿·卢格（Arnold Ruge）。卢格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德意志年鉴》的编辑，在该杂志被查封后，出于对马克思的钦佩，便邀请马克思和他共同合办一份杂志，以便把他认为的《德意志年鉴》的理论与《莱茵报》的政治主张相结合。这便促成后来两人合办的《德法年鉴》的问世。1843年10月，马克思携新婚仅四个月的妻子燕妮·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来到了巴黎，与卢格一起着手《德法年鉴》的出版编辑工作。马克思与妻子燕妮从此“开始过政治流亡者那种备尝困苦和充满自我牺牲的生活。他们出于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为了自由、民主和民族尊严，宁愿受尽放逐和贫穷的折磨，也绝不向那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屈服”^[3]。

然而，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外部压制及经费方面的缘由，更由于马克思和卢格基本思想尤其是政治主张的差异，两人的合作刚开始就很快走到终点。《德法年鉴》在出版了一、二期合刊，也是唯一

[1] [德]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9页—第440页。

[3] [德]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的一期后，同样结束了它的历史，成为又一个不幸的短命杂志。按照梅林的观点，虽然《德法年鉴》是一个死产儿，“既然它的出版人反正无法长久携手并进，那末，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下分手，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件事及早发生反倒更好。因为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沿着‘为自己弄清问题’的道路向前迈进一大步”^[1]。对马克思而言，政治上的敌对和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不能并存的，与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底决裂说明马克思交友的主要原则在于政治上的一致。

虽然《德法年鉴》过早夭折，但是它不仅留下了马克思的两篇重要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且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撰稿人中发现了自己未来的终生战友——《德法年鉴》最年轻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揭露了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严重弊端，认为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社会，非常明确大胆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些论断让马克思发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思想认识与他研究法哲学所获得的思想认识高度吻合。梅林指出：“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尽管色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的一致，达到了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的地步。”^[2]这种政治理念上的高度一致，也让马克思终于寻找到了他一辈子的同志和战友，更使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具备了必要的主观个人条件。马克思开始与恩格斯通信并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次相逢。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5页。

[2][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6页、第127页。

（三）两位伟人的首次携手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比马克思小两岁，是德国巴门一个笃信宗教的小工厂主的长子。他思维聪慧、性格活泼且勤奋异常，中学时就特别喜爱数学和语言，尤其喜爱德意志文学，并深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门父亲的工厂里当了三年小职员，这期间他广泛涉猎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注整个欧洲正在兴起的反封建运动，意识到要站在人民和革命的一边，逐步确立了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这种民主主义立场与他家庭所尊崇的正统虔敬主义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恩格斯始终不为所动。他经由施莱尔马赫对青年黑格尔派产生兴趣，也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撰写过批评谢林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1年至1842年，恩格斯作为一名炮兵手在柏林郊区的军队服役，这段经历让他一生都对军事感兴趣。1842年底，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通过《莱茵报》这个平台，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未曾谋面的“熟人”。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返回曼彻斯特，途中与被麦克莱伦评价为“把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德国”和“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 1812—1875）有过一次长谈。^[1]国内学者张一兵先生也称赫斯为“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2]。也正是由于此次会谈，恩格斯作为“一流的革命者”的形象开始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途经科伦时，还曾匆匆拜访了《莱茵报》的主编马克思。这是两人首次谋面，但此次见面似乎并不成功。恩格斯由于受鲍威尔兄弟的影响，对马克思抱有成见；而对马克思而言，他当时正与“自由

[1][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人”团体处于决裂中，恩格斯则被他视为“自由人”的同道。^[1]因此，这种因为误解而互不欣赏的心理预设导致两人初次会面的冷淡与疏离。

然而，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道理一样，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总不会因误解而失之交臂。两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历史开始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牢牢绑在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进程之中。1844年8月底，返回德国的恩格斯途经巴黎。8月28日，据说是在一间极具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著名的咖啡屋中，两位似乎命中注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恩格斯此次在巴黎共逗留了十天。在这十天里，马克思把自己在巴黎的战友、朋友介绍给恩格斯，还和恩格斯一起参加工人们的聚会和活动。每天他们都进行着非常默契的讨论和交流。他们共同感到彼此的思想观点高度一致。彼此对对方都予以高度评价和认可。两人也因此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奋斗志向。恩格斯说道：“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2]

战友关系一旦确立后，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合作和战斗。而当时他们在思想认识上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要清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辨唯心主义，并以此宣告他们与思辨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合写一部书，对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进行系统批判，同时也是对他们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某种清算，并借该书发表他们新近形成的共同的思想主张。这一次合作，也开启了两位伟人日后几十年创造性工作的崭新历程。这便是《神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2][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圣家族》一书的写作缘起。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在写作风格、生活习惯、关注的具体领域以及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有相似的中产阶级出身（当然他们后来又都同样背离了他们的阶级出身），年轻时对文学和诗歌都充满了喜爱，又都是由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走向较激进的民主主义，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自觉积极站在贫苦大众一边，为穷苦大众的利益而抗争。这些共同的经历、认识和立场使得他们自然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也为他们长久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成为人类思想史和斗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合作伙伴和战友。列宁曾经评价道：“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1]

二 | 《神圣家族》的成书过程

了解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缘由，那么，其成书过程也就容易描述了。

（一）《神圣家族》的批判对象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的历史性会晤，除了在思想上获得了高度一致的认识之外，为了表明这种一致性，两人决定合写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兄弟等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论战性著作。作品所针对的靶子就是鲍威尔兄弟等在《文学总汇报》杂志所发表的号称“批判的批判”的系列文章。

[1][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文学总汇报》杂志是鲍威尔及其追随者于1843年12月创办的。他们以自我意识为基础，大肆鼓吹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称，要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唯一的积极因素就是他们所提倡的作为“批判的批判”的理论活动，亦即作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这种纯粹的思想理论活动也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他们敌视群众史观和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精神的敌人”，是非批判的，甚至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群氓”。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这种思辨唯心主义思潮早想予以批判。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卢格就曾敦促马克思尽快撰写反对鲍威尔的小册子，马克思本人在写《巴黎手稿》时，在该书序言里也透露了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愿望。此次与恩格斯的会面与交谈，直接促使他们着手开始写作批判鲍威尔的小册子，以便对德国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进行清算。

（二）《神圣家族》书名的来历

由于该书的主旨是清算鲍威尔及其同伙的“批判的批判”的思辨唯心主义。所以，书的名称最初很明确：“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但在正式出版时，为了进一步讽喻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自以为是地超乎群众之上，并且像耶稣传道一样不容争辩的狂妄态度，马克思便借用意大利一位著名画家安得列阿·曼泰尼雅（Andrea Mantegna, 1431—1506）的一幅画作的题目“神圣家族”作为书名。这幅画描绘了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有圣母玛利亚的丈夫圣约瑟，还有圣以利沙伯、圣约翰、圣亚拿以及一些天使和神甫。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就好比是天父的儿子耶稣，而他的几个伙伴就好比是这些门徒。这幅画非常形象地点明了该书的批判对象和主旨。这或许就是这本书书名可能被人们误作文学作品或讽刺杂剧的缘由，尽管这本书的确充满了强烈的文学色彩和诗意。

(三)《神圣家族》的写作问世过程

1845年2月,《神圣家族》在法兰克福首次以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当时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合著。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其中收录了《神圣家族》。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将《神圣家族》译出,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

具体成书问世过程如下:

两位伟人在巴黎会晤,确定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计划后,恩格斯利用在巴黎逗留的十天时间完成了他所负责的七篇文章的写作任务,大约写了15页。之后,他便与莫泽斯·赫斯一起,去到莱茵地区继续宣传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而马克思则直到11月底才写完他分担的那部分内容。而此时马克思发现,他原先所设想的“小册子”已经变成了厚达300页的书。以至于连恩格斯后来都说:“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1]对于这一点,梅林认为,鲍威尔及其同伙在《文学总汇报》上所登载的有关“批判的批判”的文章,其实是不值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如此大的气力去批驳的。在恩格斯看来,《神圣家族》这本书的确是本好书,只是它的篇幅太大了,甚至许多内

[1][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

容将是广大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可能不会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恩格斯百年前对该书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显得非常正确。然而，“这书现在却具有一种在它出版时所体会不到的、至少是不如现在体会得这样深刻的魅力”。甚至有批评家在指出该书的一切缺点之后仍说：“它包含着某些最辉煌的天才的流露；这些章节，以形式的精巧和语言的洗练来说，是属于马克思的最优秀的著作之列的。”^[1]

现在距梅林写作《马克思传》又过去一个世纪了，而他对此书的评价依然发人深省，《神圣家族》究竟是否获得了它应有的关注？它的魅力是否获得了充分彰显？

三 | 《〈神圣家族〉导读》结构说明

为了尽可能以全貌的方式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这部处女作，以便完整把握书中所谈及的思想理论观点，我们采用了逐章节解读的方式，来撰写这部《〈神圣家族〉导读》。由于《神圣家族》原书各章节篇幅严重不一致，再加上各章节所讨论的思想观点的多寡也不一样，所以，在解读时，我们对各章节的导读的篇幅也不完全一致，这也使得我们的这本导读似乎成了《神圣家族》文本结构的翻版模式。

这种文本结构虽然最初并非我们的自觉选择，但结果却令我们感到意外和庆幸，难道我们又一次再现了《神圣家族》？因为这种“凌乱的”导读结构，至少从文本形式上证明了这本《〈神圣家族〉导读》是与《神圣家族》相一致的。至于导读的内容是否真正把握和揭示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的精华与魅力，就只能留给读者去评判了。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9页—第130页。

第二章

《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及其理论要旨

虽然特定的内容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但毕竟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一部书也是如此。

《神圣家族》的批判特征及被批判对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庞杂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基本写作风格。简言之，《神圣家族》是一部表面显得有些凌乱而实质包含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的典型论战性著作。

一 | 《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

（一）文本结构

作为一部典型的论战性的著作，《神圣家族》的文本由一个序言、一个结语和九章正文构成。其中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申明了该书的基本宗旨和论战对象以及由论战对象所决定的论述方式。结语则明确宣布了论战对象的灭亡。九章正文则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文学总汇报》上登载的相关文章、观点所进行的批判。

《神圣家族》的九章正文内容具体名称如下：

第一章，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二章，体现为《MUHLEIGNER》的批判的批判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三章，“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四章，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或埃德加尔先生所体

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五章，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七章，批判的批判的通讯。

第八章，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九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

这便是《神圣家族》一书的文本结构。从各标题可以看出，全书各章相对独立又逻辑连贯。每章都有特定的论战对象，从而也体现出各自的理论特征。也正是基于这个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商定了基本的写作框架之后，分头完成了各自承担的写作任务。也因为两人是分头撰写的，所以两人写作风格上的差异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二）“凌乱的著述”

正文九章依篇幅大小依次是第六章、第八章、第四章（主要是马克思所撰写的第四节“蒲鲁东”部分）、第五章和第七章。序言和前三章以及最后一章篇幅都比较小，结语甚至只有一句话。从这长短不一、论题各异乃至标题表述都极不统一的结构编排中得出这部书在形式上比较凌乱和松散的结论并不为过。当然，这样的形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论敌的特点决定的。

单从书的章节分配来看，两位作者承担的工作任务似乎差异不大。其中，恩格斯撰写了第一、第二、第三章以及第四章第四节中的前两节“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和“贝罗论娼妓问题”，第六章第三节中第二节的第一个小问题“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a) 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还写了第七章第三节中第二节的第二个小问题“‘非批判的群众’和

‘批判的批判’(b)‘软心肠的’和‘求救的’群众”。恩格斯共写了七篇文章，其余均为马克思撰写。马克思除独立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和第九章外，由他主笔的第六章、第七章均有恩格斯的部分参与，第四章的四节两人各承担两节，只是马克思所撰写的这两节字数大大地超过恩格斯所撰写的两节字数。恩格斯的两节文字只写了区区2页多，而马克思的那两节文字则写了40多页。不仅第四章是这样写的，全书也是如此。恩格斯所分担的章节一般仅用一个标题，所以说恩格斯也就完成了本书的七篇文章。而马克思所分担的章节，则一般安排了多个论述层次，然后逐一论述。所以说是马克思把书的篇幅大大地拉长了。尽管两人承担的写作任务是相当的，而最终完成的实际写作量却是极不协调的，这不仅再次表明了本书在形式上的极不规则，过于“任性”，而且更使得文本的论述内容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梅林曾经诙谐地猜测马克思故意拉长篇幅的原因，“也可能是他有意把这部东西写得很长，以便利用超过二十印张的书籍所享有的免于检查的规定”^[1]。事实上，当时普鲁士的出版检查制度因残酷扼杀新思想而臭名昭著，很多激进的学者不得不利用通过扩充篇幅的方法使著述免于政府检查，幸运的是《神圣家族》这部书也的确获得了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预查免检。看来，经常因为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而被“禁言”的马克思已经学会了如何巧妙地规避风险。据说这种技巧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用过。

从文本的内容来看，除两人合著的第四章的文字数量有明显差异外，整书的体量分布乃至完成过程更不统一。尤其是两位作者所承担的全书的“文字工作量”极不协调。恩格斯撰写的七章内容，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6页。

亦即他在书中所分担完成的总共七篇文章，在他与马克思巴黎会面畅谈的十天中就完成了，之后他就离开了巴黎。而马克思在撰写他分担的章节时，一下笔便一发不可收拾，足足写了两个多月，与他最初的只想写个“简单的对比”的“小册子”的初衷相去甚远。这也让恩格斯深感意外和惊奇，他没想到他们最终竟然对自己所鄙视的批判对象花费了如此多的笔墨。他并没有像梅林那样想到马克思或许是为了规避检查而有意拉长篇幅的。

从两人所分担章节的文字篇幅来看，马克思所撰写的部分，文字数量几乎是恩格斯所撰写的部分的20倍之多，这种情形反映出恩格斯严谨快捷、精细清晰、就事论事而马克思率性而为、不拘章法、恣意洒脱的写作风格。当然，也反映出“马克思是以他平素的那种认真彻底的方式来进行这件工作的……他大概没有时间把它弄短”^[1]。但是，这种由大约相当的写作任务出发，而写作结果极具差异的篇幅布局，不能不让人产生“整书”极不规则甚至凌乱随意的印象。

不过，反复仔细阅读《神圣家族》一书，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给人凌乱散漫、随意任性的文本结构，恰恰是对论敌无情批判的需要，是创立无产阶级新世界观过程的需要。马克思并非“任性而为”，也不像是为了规避检查而故意拉长了篇幅，他作为一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从来不会向敌人妥协的，是从来不畏惧敌人的威胁的，他其实是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在进行着《神圣家族》的写作工作。

（三）署名的奥秘

虽然马克思撰写了该书绝大部分的篇幅，但是，前已述及，从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6页。

全书的内容布局看，即从他们所选定的批判对象看，两人承担的批判任务是相当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该书初版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署名在前，而卡尔·马克思署名在后。当然，如此署名，也许是出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欣赏，也许是因为恩格斯首先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写作任务，或者更是因为书的前几章均为恩格斯所撰写，等等。具体缘由由于缺乏必要的证据就不得而知了。

而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文本，都是卡尔·马克思署名在前，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署名在后。这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该版本是根据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原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1]现在这种署名的缘由，在导读作者看来，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马克思在书中不仅批驳了论敌的观点，而且同时正面阐述了包含未来历史唯物主义形态的许多相关思想和主张。为了正面表明自己的新思想，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时，广泛利用了后来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等的诸多材料和成果，这也正是马克思撰写时间如此长和撰写篇幅如此多的根本原因。二是因为这种署名顺序符合恩格斯曾经明确表达过的两人工作分工的相关表述。恩格斯在晚年回顾自己与马克思合作撰写《神圣家族》一书时说道：“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扉页。

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 这一段话既充分体现了恩格斯谦虚低调、高风亮节的做人风格，也反映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展现出的实际理论贡献。

二 | 《神圣家族》的理论要旨

要弄清《神圣家族》一书理论要旨，固然应该从《神圣家族》文本出发进行阐述，这是必需的，也是首要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以及社会意识历史继承性的观点，我们认为，单单从《神圣家族》文本看是不够的，也是难以真切地把握该书的理论要旨的。我们不仅要把该书放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中去考察，而且更要弄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理论发展程度以及思想逻辑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脉络和理论发展逻辑

1.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脉络

众所周知，生于1818年5月5日的卡尔·马克思，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中学毕业时，他在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中表达了立志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志向。这个志向为马克思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打下了心理基础。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5页—第336页注。

和哲学。大学期间，他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并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其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反映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的最初影响。求学生涯结束后，马克思以报刊为阵地，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并在斗争中与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大学毕业前后，马克思作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尽管他始终没有全盘接受黑格尔哲学，但是他在思想上仍然属于思辨唯心主义阵营。通过《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政治斗争，马克思开始察觉到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严重分歧，开始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时期。《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也使马克思意识到国家学说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其间所写的一些政论文章，尤其是在写于1843年夏天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分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关系，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在《德法年鉴》时期，在政治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及历史使命和人类解放的认识更加明确，他开始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幻性和局限性，意识到私有制的罪恶，主张把哲学斗争和革命斗争相结合。这些认识和作为，表明马克思已经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思想轨迹上，通过体现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著所达到的理论特征看，马克思已经完成了由一位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比马克思小两岁的恩格斯虽然没有与马克思同样的经历，却有着与马克思类似的经验和思想转变轨迹。恩格斯年轻时跟马克思一样，热衷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理论，且同样作为一个革命的

民主主义战士对普鲁士君主专政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后来，他通过深入英国工人阶级而转向了共产主义。列宁说：“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1]与马克思从对国家学说的分析中走向了唯物主义不同，恩格斯是从对经济的分析中走向唯物主义的。这同样体现在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前者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2]。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也对促使马克思开始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马克思、恩格斯发生思想转变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费尔巴哈。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唯心主义长期统治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思想震撼。1843年2月，费尔巴哈又发表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再次强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一步把马克思、恩格斯推向了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期的几部著作，如《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会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哲学痕迹的原因。

2.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发展逻辑

随着唯物主义思想的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发展的逻辑上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的迫切任务，其次是要开始着手制定他们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当时，就他们的思想认识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而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们

[1] 列宁：《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9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的主要理论武器之一，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必要性。

清理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以及详细阐述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这一理论任务是之后不久在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体现的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这就是1844年到1845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全景。之后就有了1847年发表的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第一批成熟著作的《哲学的贫困》以及1848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至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正式诞生。

虽然专家对如何评判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几部著作存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轨迹上的重要节点。《神圣家族》的理论要旨就是要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去研读和把握。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主要理论任务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又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个典型变种，作为曾经的同路人和追随者，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唯心主义思想十分熟悉。而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已经产生了严重对立，并且已经在不同的著作和场合都表达了要对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系统批判的愿望。于是，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准备开始这一批判工作时，批判的对象自然就指向了鲍威尔一伙。而具体的靶子就是与《德法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第209页。

年鉴》相对抗的《文学总汇报》。

（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

1. 青年黑格尔派的蜕化与堕落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运动形式，并把由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人类精神组成的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些精彩的思想深深吸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新哲学的创立。

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他把整个世界乃至世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看作是所谓的“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这种保守僵死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也最终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瓦解。黑格尔去世不久，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矛盾终于激化。一部分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不赞成黑格尔为基督教和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辩护的立场，开始从黑格尔阵营分裂出来。他们特别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反对他的僵化体系。他们也反对黑格尔把哲学、宗教、理性混为一谈的主张，对宗教采取明确的批判态度。他们反对美化和粉饰现实，否认普鲁士专制王国是黑格尔所谓绝对观念在国家中的最高体现，主张彻底批判和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现实。马克思在大学时正是基于上述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而成为这个学派的活跃分子的。

曾经在德国政治和思想领域起到非常革命作用的青年黑格尔派，后来终于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学派在被誉为黑格尔最卓越的弟子的布鲁诺·鲍威尔的带领下，越来越蜕化和堕落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辨唯心主义。他们以黑格尔哲学卫道士的身份自吹自擂，自命为“创造历史”的“英雄”，高踞于群众之上，鼓吹个人英雄主义和抽象的唯心史观。认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

的批判”的体现者，也就是他们这些批判哲学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只是毫无生气的群氓，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如在论述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布鲁诺·鲍威尔就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宗教的废除问题，宗教解放就意味着人类的真正的政治解放。犹太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解放，主要取决于对他们所信服的宗教的废除。对于这种抽象地谈论人的解放，并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就作了批驳，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并明确提出了“人类解放”和废除私有制的内在联系。

在探索如何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时，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论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 这也就是主张把哲学的斗争和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哲学要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以便发挥自己的作用；无产阶级则要以哲学为精神武器，以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 这些观点的提出，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理解为什么《神圣家族》要对抽象的“批判的批判”进行彻底的“批判”。

鲍威尔及其同伙，貌似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正统派（老黑格尔派）观点，自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其实不过是用

[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无限的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从而滑向公开的、最彻底、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他们荒唐地视人的自我意识为人的唯一的本质，之后又把这种自我意识描绘为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的人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则和工具。而这种以“批判”为特征的自我意识并非人人拥有，只有他们这些具有了“批判”脑瓜的“英雄”才拥有。在黑格尔哲学那里，黑格尔还曾经试图防止一种错误，即认为哲学家本人就是绝对精神，但是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及其同伙那里，他们却以为自己就是批判的化身，是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的化身，正是通过他们这一化身，这种绝对精神才实现了它的宇宙精神的作用。

正因为鲍威尔一伙在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蜕化堕落到陈腐的、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深深感到，为了有效地批判这些有害思想，唯物辩证地解决和论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必须深刻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彻底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

2. 思辨哲学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运用“果实”的例子，形象地揭示了思辨唯心主义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奥秘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也就是把本来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成了独立存在的实体和本质，并且反过来把它看成是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当成主体，即客观事物的直接创造者，而客观事物反倒成了一般这个本质的简单存在形式。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五章“思辨结构的秘密”一节中举例说：“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

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1]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思辨哲学家的逻辑：先从“个别”的具体事物中抽出“一般”的共性特征，而后想象这个作为“一般”的共性特征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是“个别”存在的真正的本质，最后就宣布最初的“个别”只不过是“一般”这个真正实体的简单存在形式，是它的样式或样态，是“一般”给“个别”塞入了本质。“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2]如此以来，我们基于正常感觉的理智所辨别出的“个别”的差别，在思辨的理性看来却都是无关紧要的、非本质的。而思辨的理性却在个别的差异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一般”这个真正的本质和实体。“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3]现实的东西成了虚幻的东西，而反映这个现实的概念却成了实在的东西。这就恰恰颠倒了现实和概念即客观实在和主观观念之间的关系，暴露出其唯心主义的实质。

但是如何从“果实”这个一般实体返回到千差万别的“个别”的果实呢？思辨唯心主义也知道这是一个难题。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第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1]思辨哲学家开始“创造性”地解答这个难题。他们辩解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2]原来这个作为概念（思辨哲学家眼中的“实在”、“本质”）存在的“一般”本身就是能动的主体的东西。即“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3]。他们还继续发挥道：“‘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4]

这就是说，现实中各个具体果实的存在及其差别，恰恰就是“一般果实”创造的结果。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1]原来，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其实是他们——思辨哲学家——“进行了一次创造”。由宣布“一般果实”的存在与创造进而演变到了“自我创造”“自我活动”。马克思概括道：“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2]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到了鲍威尔及其同伙那里，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

由于鲍威尔主观片面地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这个内容，并把它推向了极端的地步，变成了绝对的抽象的东西，所以使得这个自我意识成了不依赖于具体客观世界的精神性的任意的活动。它不仅否定了作为存在源头的自然界，也否定了同样是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最终使自我意识成了绝对的造物。马克思不无辛辣地讽刺道，鲍威尔一伙的主观唯心主义比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更具有“优点”：他的批判不仅是绝对的批判，而且就是批判本身；他正在有意识地担当着救世主和创世主的角色。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鲍威尔及其同伙所宣扬的这种思辨唯心主义，不仅是极其荒谬的，更是十分有害的，宣扬这种谬论，就是要把一切“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是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3]。这就深刻揭示出了思辨哲学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及其同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包括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唯物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们自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觉地意识到，在人的主观自我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精神和主体的存在、自然和客体，简言之，存在着不以人的自我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外部世界。只有外部的客观世界和现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东西才是实在的第一性的，而一般的观念不过是从这些客观的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荒唐地认为具体的东西反倒是一般观念派生的，这实际上是基督教创世说的翻版和精致化。它不仅使一般的观念神秘化了，而且也使具体的东西成为了不可理解的东西。如果人们用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观察周围世界，那么，我们对于客观世界就绝不会有正确的认识。^[1]

（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

1.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的初步具备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在他们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的，这一点也正体现了他们在写《神圣家族》一书时的设想。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宣布：“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2]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在决定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包括清理他们自身的唯心主义哲学残余时，在他们的思想理论准备上，已经对唯物主义包括唯物史观的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形成了初步的系统认识，否则也就不可能对青年黑格尔派展开无情的批判。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时，已经站在唯

[1] 中山大学哲学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物史观的立场上，对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了彻底的批判，并揭示了诸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思想。

2. 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青年黑格尔派在论述他们绝对的“自我意识”时，不仅把这种主观意识看作客观事物真正的实体、本质，是能够外化出外部具体事物的真正主体，而且同时把这种“自我意识”当作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发展动力。

针对鲍威尔及其同伙大肆宣扬“自我意识”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歪理邪说，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和决定作用立场，予以了坚决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自我意识”在社会历史中根本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这就是说，不是思想观念决定历史的发展，而是物质生产决定历史发展。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它只是对特定时代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这种反映只能以该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为基础，并不能超出这一时代的限制。“‘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当然，思想也并不是完全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它通过指导和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显然，历史发展的根源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虚幻的“自我意识”的天国里。

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即便是物质生产，也不是任意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随心所欲的，它仍然必须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前提条件。“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 这些思想已经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神圣家族》一书时，在思想上已经接近形成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即物质生产的客观性以及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

（四）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

唯心史观必然导致宣扬英雄史观，也必然会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更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鲍威尔及其同伙也不例外。

1. 青年黑格尔派对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否认

青年黑格尔派一伙以“自我意识”化身的“批判家”身份，宣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而视那些“非批判”的群众为乌合之众，认为他们不仅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反而是社会历史前进的阻力，同时也是他们“批判精神”的真正敌人。鲍威尔一伙的逻辑是，只有主动的“精神”才是社会历史中的“英雄”，而消极的“物质”则意味着“群众”。如此一来，精神就与物质、英雄就与群众根本对立起来，于是，一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史，就具体演变为精神反对物质、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因此，鲍威尔鼓吹，“批判的批判”在批判享有特权的私有者的同时，也要批判对社会历史无所作为的无产者。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立场出发，自然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主体角色和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创造性角色，从而深刻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 马克思、恩格斯对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历史活动，无非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而这一切活动本质上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开展的活动。所以，说人民群众什么也没有创造，是“消极的”“非历史的”因素，是极为荒唐和可笑的，是睁着眼说瞎话，恰恰相反，正是群众才创造了这一切。并且，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改造愈来愈深入，广大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也会随着愈来愈发展，自然而然群众的队伍也会随之愈来愈壮大，阶级觉悟也会越来越高。显然，社会历史前进步伐的快慢以及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发展，是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的深入紧密联系在一起。

3.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论证

在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1]就是说，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受压迫、受剥削的违反人性的恶劣生活条件，决定了这个阶级必然要把追求和获得自身的解放作为其根本目标和历史使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它必须致力于消灭导致它这种处境的“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而它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这也就昭示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与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利益根本一致的；也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决定了无产阶级有能力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从而联合起来共同为推翻旧制度、旧世界而努力。无产阶级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就广度来说，还是就深度而言，无产阶级对社会历史推动和创造是任何其他阶级所不可比拟的。

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分析论证，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改变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力量无产阶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接近于认识到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一点，在恩格斯几乎同时期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有同样明确而精彩的论述。列宁曾评价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部书可以说和《神圣家族》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指明了前行之路。

除了上述主要思想外，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论战对象的相关荒谬观点时，也从正面阐述了许多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理论观点和重大问题提出了他们独特的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解，这包括对物质生产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物质与思维同一性的问题，道德的社会作用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宗教的问题，实践问题，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作用问题，婚姻与爱情问题，私有制和私有财产问题，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问题，国家、阶级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精神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等的深入论述。在谈及这些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时迸发出精彩的思想火花和独到的正面论述。这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的具体详情，将在下面我们对《神圣家族》的逐章解读中一一呈现。

第三章

吹响批判的号角

在《神圣家族》的“序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申明了该书的基本宗旨和论战对象，以及由论战对象所决定的论述方式。具体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提出三个主要思想。

一是指明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这种危害性是由他们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来解释社会，实际上这种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而根本无法解释和改变现实社会。在实际作用上，青年黑格尔派同福音传播者一样传播“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的陈腐教条，与宗教一样起到了麻醉大众的功效。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即《神圣家族》一书的基本宗旨是要批判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1]

二是说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的基本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思想集中体现在被他们把持的《文学总汇报》上，“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特别是像法赫尔和施里加这样的人“用哲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因此，对青年黑格尔派错误思想的批判就集中体现为对他们手上掌握的《文学总汇报》前八期内容的批判。这也就是《神圣家族》的论战对象。^[1]

三是交代叙述方法的基本特征及其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神圣家族》作为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叙述方法取决于批判对象的性质。因为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这也就限制了这部论战性著作的理论高度，使之无法完全呈现“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实际上就是无法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因而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用他们共同创立的理论来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对于这种不能酣畅淋漓表达自己理论的遗憾，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2]

这篇“序言”有两个概念值得注意，第一个概念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第二个概念是“肯定的观点”。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站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超越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且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当中与青年黑格尔派就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亦可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的思想其实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已经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尚未形成完全自觉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的观点”尽管已经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们仍然不自觉地在使用费尔巴哈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概念。所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页—第8页。

本书重在“批判”而非“建树”，尽管他们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建树。

第四章

下凡的订书匠

在《神圣家族》的第一章，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一伙“批判的批判”晦涩的行文风格和古奥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认为，“批判的批判”以“超出群众”然而又“万分怜悯群众”的“天父的独生子”的形象出现，声称自己“不愿意为博学的专家们写作，而要为广大的读者写作，并且要清除一切古怪的语句”。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居然“降低自己的身分”，一反常态地开始关注时代弊病和研究赤贫化问题。但是事实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从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看，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纯洁如处女，“一看到罪孽深重的害麻疯病的群众就吓得心惊肉跳”，放不下高高在上的架子。^[1]

从行文方式上看，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语言”^[2]，他们热衷于生搬硬造不可理解的词句，故意把群众语言改造成高深莫测的词句。从写作思路上看，“批判的批判”东拉西扯，故意炫耀抽象的思维方法，造成的结果不但群众不能理解，甚至它自己也无法理解。通过直接引述赖哈特文章中大量故弄玄虚和令人费解的语句，恩格斯指出，这种故弄玄虚的行文和思维方法不但不能证明青年黑格尔派的高深，反而是把他们的身份降低到极点。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将以赖哈特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比喻成下凡的“订书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第五章

『儿子生父亲』的颠倒历史观

在《神圣家族》第二章，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分子茹·法赫尔凭借黑格尔“儿子生父亲”的颠倒方法论在历史领域当中的“胡言乱语”。^[1]

以茹·法赫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根本不承认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应该“从它的群众性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一旦“承认卑贱的群众”在历史当中的作用，无异于否认历史发展“批判的判决”即概念演绎的过程，因此，他们强调必须运用概念演绎来代替真实的历史发展。^[2]茹·法赫尔将这种历史观运用于英国工业史的研究，其成果就是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7、第8期的《英国的迫切问题》，恩格斯以形象的语言为我们揭示了茹·法赫尔的一系列荒谬见解。

在现实历史中，工厂出现以前是没有任何工业城市的，可在茹·法赫尔看来，“曼彻斯特、波尔顿和普累斯顿在谁都还没有想到工厂以前就已经是繁荣的工厂城市了”^[3]。在现实的历史中，骡机是在改进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茹·法赫尔却把骡机解释成“这两个极端的思辨的同一”^[4]。实际上，随着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的发明，立即有了在这些机器上运用水力的可能，但是茹·法赫尔却把使用水力的工具和水分割开来，把水力的运用当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一种“完全特殊的東西”归于较晚的时代。在历史上，蒸汽机的发明出现在较早的时期，但是茹·法赫尔却故意把蒸汽机的使用列在最晚时候而誉为“整个建筑物的顶点”。在历史中，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联系是商品出口的结果，而茹·法赫尔却认为这种商务联系是出口的原因。在历史中，英国的工厂里存在着很多工资等级，但是在茹·法赫尔看来只存在一种工资等级。在历史中，是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而在茹·法赫尔看来，却是机器代替了思维。在当时的英国，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实行的联合是被允许的，而在茹·法赫尔看来，这种联合却是被禁止的，因为“群众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请求批判的允许”。在现实的工厂环境中，劳动是极端折磨人的，而在茹·法赫尔看来，这种劳动并不辛苦，因为“出力的是机器”。在历史中，机器就是机器，而在茹·法赫尔看来，机器却有意志。^[1]

如果这些论点还不够荒谬，恩格斯继续列举了更为荒谬的论点。茹·法赫尔因为不满英国的工人政党，不仅主观臆造了所谓的“工人党”，并且“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2]。茹·法赫尔认为工人不给反谷物法同盟捐献基金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护宪章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贫穷。茹·法赫尔认为一旦英国的谷物法被废除，农业短工就一定会同意降低工资。但是恩格斯指出，农业短工的工资根本就没有降低的余地，因为他们的工资仅够生存。茹·法赫尔认为财产的集中及其对劳动阶级所造成的后果并没有被认识到，实际上不仅宪章派、社会主义者，甚至连资产阶级都对这种现象看得很透彻。茹·法赫尔还曲解了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关于机器磨损以及约翰·罗素勋爵关于选举制度的相关论述并横加指责。这些指鹿为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的例子还包括茹·法赫尔对英国工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和参与反谷物法等事件的歪曲和指责。茹·法赫尔甚至还生硬地改造英语词汇，闹出了笑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面即群众的愚蠢”，他们之所以醉心于制造他人的愚蠢，就是为了对着自己幻想的靶子横加批判，从而“更加鲜明地衬托出自己的聪明”。^[1]

恩格斯最后指明，以茹·法赫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资本主义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茫然无知，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的傲慢臆想和胡说八道。恩格斯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茹·法赫尔一伙“着手改造英国的历史和英国的语言是从原则出发”^[2]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在“批判的批判”看来，是思维创造了历史，不是历史创造了思维，不是逻辑的发展要符合历史的逻辑，而是历史的发展要符合思维的逻辑，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的“儿子生父亲”的思维方式在作怪。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第六章

掌控历史的批判哲学

在《神圣家族》简短的第三章中，恩格斯以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荣格尼茨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6期上的《瑙威尔克先生和哲学系》一文为标靶，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用逻辑演绎强制规定历史事实的错误思想。

1841年10月，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布·鲍威尔因为发表批判《圣经》的著作《同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被普鲁士政府暂时剥夺了在波恩大学讲学的权利，当局又于次年3月将他永久开除。此后不久，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名干将K.瑙威尔克因为与代表官方哲学的柏林大学哲学系发生争论而自动离职。尽管我们现在无从知晓瑙威尔克与柏林大学哲学系争论的具体内容，但是这次争论肯定也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普鲁士官方哲学的一次冲突。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把布·鲍威尔视为批判哲学的化身，在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他们所组成的“自由人”小圈子看来，布·鲍威尔被普鲁士政府解职是批判哲学遭受的重大挫折，是批判哲学所经历的“世界性事件”，是普鲁士政府反动性的典型象征，于是他们开始向普鲁士政府发动更猛烈的抨击。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荣格尼茨的文章《瑙威尔克先生和哲学系》就是这种抨击的具体表现。

在荣格尼茨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瑙威尔克和柏林大学哲学系的争论及其离职事件具有和布·鲍威尔被普鲁士政府解除职务同样重大的意义。荣格尼茨在文章中用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来解释瑙威尔克和柏林大学哲学系争论所牵涉的很多具体问题，如青年黑格尔派为什么一定要和普鲁士国家哲学发生冲突，这次冲突为什么不像布·鲍威尔被普鲁士政府解职事件那样激烈，为什么瑙威尔克除

了自动离职别无选择等。对于这些问题，荣格尼茨“用四页的篇幅以罕有的彻底性”证明了历史的发展应该服从思辨的逻辑。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一切历史都是被思维的逻辑所决定的，思维的逻辑决定了“为什么这一切正是这样发生，为什么无论什么神都无法反对”，这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已经被思维发展的逻辑“充分认识”。^[1]

恩格斯认为，“批判的批判”之所以把波恩的解职事件上升为“批判的解职的哲学”，^[2]不惜将之推上“构成了时代……的冲突”^[3]的高度，正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用黑格尔的思维逻辑来钳制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他们高傲地把任何事件都视为尽在批判哲学掌控之中。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批判看起来气势恢宏，实际上大而无当，因为他们的批判仅仅局限在思想领域，在完成了思维批判之后，“批判的批判”又回归到“认识的宁静”状态，^[4]时光永恒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第七章

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大出其丑的埃德加·

在《神圣家族》的第四章，马克思、恩格斯分别针对批判哲学的干将埃德加尔·鲍威尔在有关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问题、娼妓问题以及爱情观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重点批判了埃德加尔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无知可笑。

一 批驳埃德加尔对工人阶级社会作用的蔑视

1844年4月，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埃德加尔在《文学总汇报》第5期刊发了其对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一书的评论，在这篇评论当中，埃德加尔秉承青年黑格尔派的一贯思路，提出了要用批判哲学改造工人阶级的观点，对此，恩格斯对埃德加尔提出了严肃的批判。

埃德加尔满足于“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1]，因而极端轻视“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在他看来，只有概念的创造才是一切，“凡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都是非批判的、群众的，因此，它是‘无’”^[2]。在埃德加尔看来，工人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具体的需要而进行的，工人不参与概念的创造，所以，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工人的社会价值不值一提。^[3]埃德加尔认为要用批判哲学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来改造工人阶级。

就埃德加爾所提出的“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的观点，恩格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恩格斯认为，工人“什么也没有创造”仅仅在“劳动没有组织起来”的意义上才部分成立。实际上，工人的劳动是整个社会历史和人类精神生活得以存在的基础。“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尽管埃德加爾看到了“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東西”因而影响到工人阶级整体社会作用发挥的现状，但是当同样的看法被弗洛拉·特莉斯坦阐发出来的时候，“批判的批判”却傲慢地声称她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恩格斯指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不是弗洛拉·特莉斯坦，恰恰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的批判哲学家们。恩格斯形象地讽刺道，尽管黑格尔哲学已经被时代抛弃，但这并不妨碍批判哲学家们把黑格尔哲学这个“年老色衰的老太婆”擦脂抹粉，“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1]

在第四章第一节，恩格斯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工人尽管创造了整个社会得以存在的物质财富，但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还是不能有效发挥，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缺乏组织。恩格斯在这里暗示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必要性，这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打下了基础。

二 | 批判埃德加爾在娼妓问题上的错误

当埃德加爾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讨论“巴黎的一位警官贝罗所著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的关于娼妓制度的书”^[1]时，他为该警察仅仅从专业的观点来考察而不是从“批判的批判”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感到惊讶。恩格斯对批判哲学家埃德加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认为批判哲学家因为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姿态，对于娼妓问题实际上束手无策，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跟娼妓在一起鬼混”^[2]，这说明了埃德加尔一伙在学术上的虚伪性。

③ | 批判埃德加尔关于爱情的观点

埃德加尔借评论冯·帕尔佐夫夫人的小说的机会，表达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爱情的观点。在埃德加尔看来，批判精神本身就内含着人类本质（包括爱情）的全部内容，这种本质是不假外求的，完全可以通过黑格尔式的抽象概念推演得到，因此批判哲学的爱情不是对外在对象激情洋溢地追求，而是一种在概念的必然性推理中得到的“认识的宁静”^[3]状态。在不食人间烟火的批判哲学家眼里，没有比作为感性存在的爱情更危险的东西了，因此，埃德加尔在其评论当中把爱情这种物质情欲比作“灾祸”、“妖魔”、“凶神”、“怪物”和“撒但”，严加批判。

马克思通过对思辨唯心主义的分析，批判了这种“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切直接的东西、一切感性的经验”^[4]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爱情观。批判哲学家埃德加尔认为，爱情的可怕之处，就是它是一种物质性的情欲力量，它“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物世界”^[1]，而且它以一种“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的视角来追求“诱人的、多情的、内容丰富的”爱情对象^[2]。批判哲学非常惧怕爱情所内含的唯物主义因素，就是因为爱情“是非批判的、非基督教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指出，批判哲学对于爱情的批判经过了三个步骤。首先，把“爱情”这个属人的特殊本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之独立存在。然后，“通过谓语到主体的这一转变”，把“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这样就“把人所固有的一切规定和表现都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3]最后，批判哲学使用自己驾轻就熟的神学批判方法把爱情这个“凶神”作为名正言顺的批判对象，从而使爱情这个“来自异乡的少女”被“批判的警察驱逐出境”。^[4]

四 | 批判埃德加爾对蒲鲁东的曲解和攻击

在第四章篇幅最长也是最重要的第四节，针对埃德加爾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一书的曲解评论，马克思进行了细致的反批评。马克思认为，埃德加爾根本就不懂蒲鲁东，也不愿意弄懂蒲鲁东，因此，埃德加爾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这本书展开的批判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在翻译上曲解蒲鲁东的思想（“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的暗中攻击”）的错误，二是曲解蒲鲁东的理论主张（“通过批判的评注的公开攻击”）的错误。这两种错误比较起来，马克思认为“埃德加爾先生在翻译时比他在做评注时更为毒辣”。^[5]因此，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克思分别从“赋予特征的翻译”和“批判性的评注”两个方面来分析埃德加尔对于蒲鲁东的歪曲和误读。

（一）埃德加尔在翻译上的曲解和误读

埃德加尔一方面受制于自己抽象的思辨哲学体系，一方面受制于自己低下的法语水平，用源于批判哲学的深奥孤僻的思辨语言曲解蒲鲁东源于生活的鲜活明快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蒲鲁东的原意。马克思用“批判的蒲鲁东”、“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和“蒲鲁东第一”指代被埃德加尔的蹩脚翻译抽象理解了蒲鲁东，用“群众的蒲鲁东”、“非批判的蒲鲁东”和“蒲鲁东第二”指代真正的蒲鲁东。

首先是在词汇和语句上的曲解和误读。

真正的蒲鲁东声明，“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学的目的，而只是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1]蒲鲁东的这些要求不是任意提出的，而是有现实根据的，但是埃德加尔却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认为不真实的原则是真实的，真实的社会存在是不真实的，真实的社会存在应该服从于抽象概念的力量，因此，埃德加尔赋予蒲鲁东“具有与群众的身分相称的驯顺的性格”，并将他的要求翻译为“不敢奢望提供新东西的体系”和“只是希望废除特权”。^[2]蒲鲁东的原话是，“难道人不可避免地永远不幸吗？”^[3]埃德加尔则将之翻译为“不幸是不是人的道德本份？”^[4]蒲鲁东抨击的是“改良办法的杜撰者”，而埃德加尔则将之翻译为“改良主义者”；蒲鲁东把各种类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第2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的“改良办法的杜撰者”加以区别，而埃德加爾则让同样的改良主义者“时而谴责这个，时而谴责那个”。^[1]蒲鲁东的原意是说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埃德加爾则把无知翻译为愚蠢，把“堕落腐化”翻译为“下流无耻”。^[2]蒲鲁东用最明快的语言叙述他怎样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感到惊讶，埃德加爾则将之理解为“一开始就有了现成的见解”^[3]。蒲鲁东认为，伪造的原则的对象是真实的，埃德加爾则将之理解为“不真实的原则的实质是真实的”^[4]。蒲鲁东认为法律是公平事物的“宣告”，埃德加爾则理解为“法律是公平的事物的规定”^[5]。蒲鲁东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贤者”所预料到的，埃德加爾则将贤者翻译为“哲学家”；蒲鲁东认为，罗马“法经过千年来的法律实践或司法活动而神圣化了”，埃德加爾则认为在罗马存在着“被千年来的公平所神圣化了的法”。^[6]蒲鲁东说，“罗马在宗教方面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是偶像崇拜，在国家生活方面，是奴隶制，在私人生活方面，是享乐主义”，但在埃德加爾那里，“偶像崇拜、奴隶制和软弱无能构成了罗马各种制度的基础”。^[7]马克思不厌其烦地列举埃德加爾对于蒲鲁东思想的种种蹩脚翻译和恶意曲解。

其次是在地产私有问题上的曲解和误读。

在地产私有这个问题上，蒲鲁东认为，光保证劳动者得到他的劳动果实而不同时保证他有生产工具是不够的。为了使弱者免受强者的侵害，必须在占有者之间划下固定的分界线。但是在埃德加爾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那里，这个中间过程全部被概念演绎所忽略了，埃德加尔认为地产是在分割土地的那一瞬间出现的，靠“趁此机会”^[1]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实现了从占有到财产的过渡。

再次是对萨伊和沙尔·孔德关于财产所有权讨论的曲解和误读。

蒲鲁东认为，所有权与劳动密切相关，劳动只能占有劳动产品，“只要人不再是一个劳动者，他也就立刻不再是一个所有者了”，“产品所有权无论如何决不能产生对构成产品基础的材料的所有权”^[2]。正如捕鱼最多的渔夫不能成为他捕鱼的那一地段的所有者，猎术高明的猎人不能获得整个地区野兽的所有权一样，劳动者只能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不能产生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之所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一些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不是因为这些人对自然资源施加劳动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人通过非法的手段来掠夺这些资源。对于蒲鲁东的这种观点，马克思是赞同的，他们反对那种认为“对土地的开垦‘创造充分的土地所有权’”^[3]的错误观点，认为，“一个所有者之为所有者，只由于他是一个劳动者”，而“只要他不再是劳动者，他也就立刻不再成其为所有者了”^[4]。人之所以不能因为劳动而获得对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根本上还是因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5]。

但是埃德加尔依据其批判哲学完全曲解了萨伊和沙尔·孔德的相关论述。埃德加尔要求沙尔·孔德改变从“有限和无限”这两个概念出发来进行论证的方法，要求他把“不必需和必需”这两个概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念当作主要范畴，从而得出有利于批判哲学的结论。^[1]埃德加爾认为萨伊从土地比空气和水易于占有这个事实，“立即引伸出把田野变为财产的权利”，可是萨伊根本没有通过这样的论据引申出土地所有权，相反地，他毫不含糊地说：“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是由掠夺而来的。”^[2]在马克思看来，埃德加爾的论证十分幼稚，因为以空气和水取之不尽为理由论证它们始终都是公有财产，而以其他资源数量有限为理由论证它们成为私有财产的论证方法同样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通过对蒲鲁东在理解萨伊和沙尔·孔德观点上的辩护，马克思高度认同蒲鲁东关于“私有财产就是盗窃”这个观点。正是通过讨论对自然资源进行私有化的不合理性，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肯定了自然对于人类劳动的先在性原则，这一点对于明确唯物史观的物质本体论立场，对于承认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特征的曲解和误读。

蒲鲁东的本意是责备法国无产者没有德行，但是埃德加爾则将之翻译为法国的无产者有没有“力量”；蒲鲁东完全肯定无产阶级在工作中的“敏捷”，但是批判哲学则将之翻译为工作中“靠不住的熟练”。^[3]蒲鲁东指出了资产者的伪善，但是批判哲学则把资产者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当蒲鲁东谈到法国资产者的“邪恶意志”的时候，批判哲学却偏偏将之理解成“市民们的无忧无虑”。^[4]马克思对于批判哲学家低下的翻译水平报以辛辣的嘲笑，尽管埃德加爾“通过翻译真正的蒲鲁东的著作创造了一个批判的蒲鲁东”，完全误解了蒲鲁东的原意，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批判哲学家在报纸上振振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

词地攻击那些“书市上泛滥的”以及“德国文坛目前萎靡不振”的“拙劣的、群众的”译品。^[1]

（二）埃德加尔在评注上的误解和攻击

第一是在评价蒲鲁东批判私有制的功绩问题上的误解和攻击。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承认私有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从来不容怀疑的，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划时代的巨大进步，它“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2]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尽管将私有制作为研究的前提，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暴露着私有制前提的荒谬性。亚当·斯密攻击资本家，特拉西攻击银行家，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者，都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反对私有制的不自觉的体现。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把“经济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与“经济关系的违反人性的现实”尖锐对立起来，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因此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属性，从而“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甚至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3]但是批判哲学家埃德加尔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蒲鲁东否定私有制并非什么新的发现，“对于批判的批判说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蒲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第6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东“不过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1]这反映了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学也同样是无知的。尽管无知，但是这并不妨碍“‘批判’——要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另一个对立面——‘群众’”^[2]，从而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大加批判。

第二是对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作用的误解和攻击。

在关于私有制的存在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作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私有制之间构成一对矛盾。私有制的存在以其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同样的道理，无产阶级如果不消灭自己的对立面私有制，也就不能消灭自身。尽管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是在这对矛盾中，“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3]。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对这种异化状态的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4]。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会趋于消灭。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消灭私有制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并不是因为“批判的批判”把无产者看作神，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因此，“如果它不消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1]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革命性，既是由无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道特征所决定的。也正是认识到了这点，在研究私有制这个问题上，蒲鲁东从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瞩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来研究。批判哲学家埃德加尔却恰恰相反，他不屑于做事实分析“这类鸡毛蒜皮的琐事”^[2]，直接“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并且认为“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3]。他虚幻地构造了“贫穷”和“财产”这样的概念，通过概念间的抽象演绎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用仅仅在自己想像中所做到的事情来反驳蒲鲁东的真实的事情”^[4]。因此在埃德加尔那里，私有制和无产阶级只是作为两个概念遭到了形而上学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关系根本不曾被动摇。

第三是对如何证明私有财产不合理问题的误解和攻击。

在具体分析“根据什么来证明财产是不可能的”^[5]这个问题时，埃德加尔和蒲鲁东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就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指出，埃德加尔和蒲鲁东思想的差异就在于蒲鲁东研究的是“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6]，试图“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服政治经济的异化”^[1]。而埃德加爾则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断的基础”，“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2]。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但是埃德加爾到处都只看到一些范畴，他们在“拥有和不拥有、工资、奖金、匮乏和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3]等范畴的演绎当中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在埃德加爾看来，真正的哲学是超验的，过去的哲学之所以未能实际干预事物的进程，正是“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批判哲学应该“高高地君临于实践之上”^[4]。但是现实生活并不仅仅是范畴，蒲鲁东透过范畴正确地看到了以前很少有人考虑的现实，即私有制所带来的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这才是思想家最值得思考的对象，只有通过现实的分析研究，才能证明私有制的不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已经认识到了但却“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就是“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5]。这句话一方面表明马克思对于蒲鲁东评价过高，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已经具备潜在的唯物史观。

第四是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误解和攻击。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现，也是古典政治经济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学思想具有革命性的重要体现，但是受制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私有制立场，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这种思想继续发扬。蒲鲁东敏锐地认识到劳动价值论对于否定私有制的革命性意义，这说明蒲鲁东迈开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性改革的第一步。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既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规定产品价值的量度，因而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1]，这也是马克思高度推崇蒲鲁东，认为蒲鲁东的水平远远高于德国批判哲学的重要原因。

蒲鲁东主张，时间不能变占有为财产，在这个意义上，“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不能创造、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都不能革新的时间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该物品的所有者”^[2]。这表明了蒲鲁东反对资本家将无产阶级劳动产品攫为己有的无耻行径。但是，埃德加尔却把蒲鲁东法语当中的“价值”一词译作“重要性”并到处乱用，由此就把“法律原则上的重要性”等同于“劳动产品的商业价值”^[3]，因此，蒲鲁东的原意就被曲解为“在事物的重要性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4]。因此，埃德加尔得出结论，蒲鲁东“没有理由把时间当做报酬的量度”^[5]。马克思指出，埃德加尔之所以敢于指责蒲鲁东，并不是因为批判哲学对蒲鲁东的思想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恰恰相反，埃德加尔“连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都还未能认识，更谈不到加以考虑”，就运用“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6]来讨论和批评蒲鲁东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劳动价值论，从而使他“真正以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1]。

第五是在无产阶级解放问题上的误解和攻击。

马克思指出，埃德加尔在对待蒲鲁东的态度上存在“希图侥幸的本能”^[2]，这使得他不去深究蒲鲁东关于利息和利润的理论却要对蒲鲁东大加批判。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关于私有制运动的十分实际的知识，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鲁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全是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指出，批判哲学之所以不愿意去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是由批判哲学的思辨本性所决定的。批判哲学所陷入的尴尬境地证明，批判哲学要想真正深入地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思想，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抽象思辨哲学，研究关于私有制运动的实际知识。受制于批判哲学的思辨思维方式，埃德加尔认定决定着工人屈辱生活方式的原因只存在于工人的思维当中，因此，埃德加尔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那么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3]但是工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工人遭受的压迫并不是在他们的思维当中，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经济生活当中，因此，要消灭这种压迫，也只能通过“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埃德加尔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不过是利用经过批判哲学改造过的蒲鲁东去反对蒲鲁东而已。埃德加尔“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来生活了”。^[1]

第四章第四节是《神圣家族》当中比较重要的篇章，从这一节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正处于思维范式转换的激荡过程之中。一方面，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他在《巴黎手稿》当中深陷其中的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立场，他还在尝试使用人的异化及其复归的理论来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作为这种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于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的评价过高，这也说明马克思并没有自觉地发现蒲鲁东和费尔巴哈两人存在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和蒲鲁东与费尔巴哈很大的一致性。马克思（也包括恩格斯）之所以还停留在抽象人性论的认知范式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够透彻，因此他们在本节当中对于蒲鲁东和埃德加尔的评论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高度推崇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的思想，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们急切地想逃出青年黑格尔派的思维母体，有道是“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马克思在字里行间渗透着的对蒲鲁东的爱，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恨铁不成钢”。另一方面，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哲学的批判，特别是通过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埃德加尔的批驳，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近似于发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批判哲学这种抽象思辨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不是实际的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思维，而是人的思维决定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这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神圣家族”所有成员的主基调。可以说，这种思维基调是受到了费尔巴哈的重要影响，但是费尔巴哈主要是在自然界层面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来思考存在和思维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则把这个问题拉到了社会领域来认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分析社会历史层面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水平的一个重大飞跃。但是，这种进步性一定不能高估，马克思在这本书当中并没有深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对于人们思维的具体机制问题，或者说还没有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相互关系的辩证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尚未形成，科学的实践观更未成形，完整的唯物史观尚在形成之中。表现在本节当中的范式转换，其实是一种临产前的阵痛。

第八章

揭露『批判的批判』的秘密

| 引子 |

“秘密” 以及 “秘密” 的秘密

《神圣家族》第五章题目为“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第八章题目为“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这两章由马克思独立撰写。马克思在这两章批判的对象是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施里加及其在《文学总汇报》第7期上发表的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

《巴黎的秘密》是由法国作家欧仁·苏在1842年至1843年创作的一部反映下层民众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叫作鲁道夫的德国封建王公子弟。鲁道夫为赎补他青年时代犯下的放荡罪过，微服出访巴黎，深入社会下层，通过赏善罚恶，除暴安良，对“刺客”、玛丽花和“校长”等人进行批判改造，同时他还通过创办“贫民银行”“模范农场”等慈善事业，救济穷人，改造社会。小说突出描写了底层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这一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肯定。恩格斯指出：“这本书以明显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1]但是欧仁·苏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唤醒下层阶级的革命热情，相反，欧仁·苏认为理想的社会是由笃信宗教安贫乐道的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页。

层人民和自我克制乐善好施的上层阶级组成的。在这部以伤感庸俗的笔调写成的长篇小说中，欧仁·苏详尽描述了主人公鲁道夫的道德感化、阶级调和和社会改良试验，为读者树立了一个救民于水火的道德英雄形象，展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乌托邦蓝图。

小说在出版之后立即轰动了巴黎舆论界，并且迅速波及全欧。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在其把持的《文学总汇报》上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来赞美这部小说，他们认为这部小说引发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把欧仁·苏誉为“批判的哲学家”和“时代的旗帜”，并且心甘情愿地充当“贩卖秘密^[1]的商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之所以狂热崇拜这部小说，是因为小说的创作原则与青年黑格尔派所热衷的思辨原则不谋而合。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纷纷使用借尸还魂的手法，利用这部小说来为其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张目，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评论家齐赫林斯基（笔名施里加）。施里加的评论刊发于《文学总汇报》第7期（1844年6月）。在书评中，施里加把《巴黎的秘密》吹捧为体现了思辨唯心主义的“史诗”，而把小说主人公鲁道夫看作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体现者，说他是“领会了纯批判的思想”（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的“人类国家的头等公仆”，而一旦鲁道夫“敢于无情地批判”，从而使思想变成现实，人类世界的罪恶就会得到拯救。同时，施里加也把自己视为和欧仁·苏一样写“史诗”的“诗人”，认为不管是欧仁·苏的小说还是自己的评论都具有永恒的意义。施里加以典型的思辨唯心主义方法进行文艺评论，他首先从小说中概括出“秘密”这个范畴，进而把“秘密”这个范畴变为实体和主体，最后他又把小说中描写的伯爵夫人、玛丽花、看门人、公证人、江湖医生、桃色事件、舞会甚至木门都视为“秘密”主体的

[1] 指《巴黎的秘密》，笔者注。

外在体现，即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看成是“秘密”的外化。施里加文艺评论的实质是用唯心主义的迷雾掩盖事物的本质，其目的是宣扬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在其独立撰写的第五、第八两章集中围绕《巴黎的秘密》及施里加对这部小说的评论进行批判，但是两章写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第五章，马克思主要以施里加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为批判对象，集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进行“批判的批判”所体现出来的思辨唯心主义。在第八章，马克思主要以欧仁·苏及其作品《巴黎的秘密》为批判对象，集中批判欧仁·苏小说中的反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和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

要想深刻理解《神圣家族》第五、第八两章，首先要理解一个关键词即“秘密”。欧仁·苏谈到巴黎的“秘密”，施里加谈到思辨的“秘密”，马克思也用“秘密”二字讽刺欧仁·苏和施里加，不管是欧仁·苏、施里加还是马克思，他们都是在“借他人之酒浆，浇自我之块垒”。对欧仁·苏而言，他的秘密其实就是阶级调和、社会改良和道德救赎，他想通过对巴黎的秘密的描述，来实践他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对施里加而言，他的秘密就是利用欧仁·苏的小说来阐释他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让他在评论欧仁·苏小说的过程中过把概念思辨天马行空的瘾。对马克思而言，秘密不仅是批判，更是建树，即发现社会、历史、国家、阶级甚至文学创作的真正奥秘。换句话说，马克思就是要借批判欧仁·苏和施里加的机会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秘密。

现在我们就以逐节解读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对施里加“批判的批判”的“批判”。

一 “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

在“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这一小节中，马克思由费尔巴哈对基督教投胎降世、三位一体、永生不灭等观念的批判入题，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秘密的揭示。与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秘密的揭露相反，施里加则要把现实都变成秘密，或者变成秘密的外化。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费尔巴哈是把基督教关于投胎降世、三位一体、永生不灭等观念的东西解释成现实的东西，那么施里加则是“把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变成了秘密”，施里加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1]施里加试图把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文明中的野蛮以及国家中的无法纪和不平等都说成是秘密而加以掩盖。施里加的图谋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是无视已经被科学研究大白于天下的现实，要么是要把这些已经被揭露的秘密重新用“批判的批判”来包装，使之成为缥缈虚幻的概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施里加把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与不平等都说成秘密，他不是在实际的土壤之上，而是在概念的演绎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马克思接着以具体事实证明他的上述论断。

施里加声称：“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所有的人不论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这一原理在国家的信条中占着首要的地位。”^[2]但是现实社会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的信条从一开始就规定富贵贫贱在法律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前的不平等。贫富间的质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些听命于富人的学者们一直在大肆宣扬保留贫困的必要性。欧仁·苏甚至希望通过富人大发慈悲来改变贫富现状，他说：“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1]

欧仁·苏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罪犯麇集的酒吧间和他们的言谈，他之所以要描写酒吧间的这些场景，是因为“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2]，但是施里加却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描写罪犯的言谈和巢穴，而是要“研究作恶的动机的秘密”^[3]。可以发现，施里加在这里使用了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手段，硬要把对欧仁·苏的小说的评论装进他“批判的秘密”的框子里，硬要用批判哲学的思辨模式来套欧仁·苏的小说，最终只能是弄巧成拙。马克思指出，施里加把“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说成秘密，也就是要把它们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接着就迫使“秘密”按照他的意愿开始自己的思辨历程。

二 | 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秘密

此节可以说是《神圣家族》当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马克思在这里正面分析和揭露了批判哲学家思辨唯心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马克思指出，施里加对《巴黎的秘密》所做的批判性评述的秘密，实际上就是“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他“对‘巴黎的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各个细节方面的运用”。^[4]接下来，马克思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析了黑格尔和批判哲学这种思辨结构的总特点。

马克思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思维方式，他说：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die Frucht]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1]

马克思在这里对于思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做了形象但也入木三分的描述，作为人的理性思维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归纳方法作为从殊相到共相的思维方法，是从特殊属性归纳出一般概念的方法；演绎方法作为从共相到殊相的思维方法，是从一般概念演绎出特殊属性的方法。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并不存在先后之别，只存在思维顺序之别。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先是从现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第72页。

实存在的特殊事物中抽象出一般共性，然后，把这个本来作为观念存在的一般共性设定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最后，又把这种作为“实体”存在的一般共性理解为独立的“主体”，并且以“主体”的身份反过来表现和演化出现实中各种特殊的具体存在样态。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思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极为有害，首先是这种方法“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1]。马克思举例证明，如果一位矿物学家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么这位矿物学家不可能对矿物有深入的了解。要从抽象转到抽象的直接对立面，必须抛弃抽象，但是对于批判哲学而言，要让他们抛弃抽象概念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概念如何演绎出特殊的个体？思辨哲学家并不愿意直接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而是通过赋予抽象概念以“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2]来解决这个矛盾。也就是说，殊相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共相的自我差别，抽象概念被理解为“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3]。这种思辨哲学的直接后果就是，它造成了特殊的东西仅仅是普遍的东西的特殊化身，“是理智所创造的抽象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4]而已。这种殊相“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是“绝对主体的化身”。^[5]

马克思认为，批判哲学之所以自命不凡是因为他们故弄玄虚，他们故弄玄虚的秘密就在于他们认为特殊的東西都是概念自我演绎的结果。在普通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批判哲学家看来都是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页。

概念演绎的结果，是“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1]。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2]。正是在分析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马克思指出了施里加的思维方式与黑格尔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施里加把现实的关系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中，并且用同样的方法把“秘密”变为实体和体现现实关系的独立主体。于是，现实的东西就成了这种主体的表现。施里加起初“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而现在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3]。如果说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还因为包含着对于现实关系的分析而呈现出模棱两可的外表，那么施里加的思辨体系则“以极其诚实而坦白的态度”毫不犹豫地否定了黑格尔思辨体系中“现实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现实事物这种“碍手碍脚的附属物”。^[4]正是在发展了极端唯心主义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讽刺施里加“第一次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5]。

可见，以施里加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批判家们，比他们的先辈黑格尔走得更远，走得更偏，走向一种更直白的主观唯心主义自我哲学，是绝对主观的唯心主义。在以施里加、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那里，理性思辨和现实（思辨对象）之间的对立已经自然消解，一切现实的变化本质上都是自我意识这个主体的自我运动和变化，这就是思辨结构的真正秘密——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

作为《神圣家族》当中重要的一节，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三个重要思想。第一，马克思第一次指出了一切思辨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式，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

即颠倒了殊相和共相之间的关系，不是实事求是地认为殊相产生了共相，而是倒果为因地认定是共相产生了殊相。第二，揭露了思辨唯心主义所必然遭遇的理论困境以及他们化解困境的独特思维方式。思辨唯心主义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他们不能有效说明一般共相怎样产生无穷殊相，他们化解这种理论困难的方式不是面向生活世界，而是赋予共相以自我区别和自我运动的属性，认为个体的差别仅仅是概念的创造过程，是“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第三，马克思指明，批判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和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和黑格尔的思维一脉相承，批判哲学甚至把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思维逻辑发展到极端，走向极端自我唯心主义，因而是一种荒谬的哲学。

③ | 上流社会的秘密

在“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这一小节中，马克思指出，随着欧仁·苏在其小说中将描写场景从“罪犯麋集”的社会下层酒吧间转移到上流社会的舞会，施里加也从对下层社会“秘密”的分析转移到对上流社会教养的分析。马克思据此深入分析了施里加故弄玄虚的哲学思辨路径和文艺评论方法。

在欧仁·苏的小说中，从平民社会转到贵族社会的过程是通过写作小说的一般手法（也就是大家都这么写）来完成的，施里加却故意用“秘密”这个概念的演绎来解释小说情节的转换。施里加对于这一转变的解释是：“秘密……以前一直作为一种绝对猜不透的、完全不可捉摸的、否定的东西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相对立；而现在它又作为后者的不可觉察的内容而渗入了后者。但是这样一来秘密也就消除了被认识的绝对不可能性。”^[1] 这也就是说，“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密”这个概念原来与现实的东西相对立，因而不可捉摸，现在“秘密”完成了“新的转变”，渗入了巴黎上流社会，因而“秘密”可以被认识了。马克思指出，施里加故弄玄虚，望文生义，他的“秘密”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轻浮佻达，无拘无束，卖弄风情”的“形而上学的主体”^[1]而已。马克思列举实际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

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鲁道夫而言，他乔装打扮来到各个场合，这无非是为了满足他“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感到极其有趣”的猎奇心，但是批判哲学家施里加却按照概念演绎的逻辑得出鲁道夫的猎奇行为使人“相信人们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的荒谬结论。^[2]

施里加还用自己天真的概念演绎去规范小说中两个“绝代佳人”达尔维尔夫人和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谈话，想得到她们为孩子们和丈夫祝福的话语，但是实际上她们之间的谈话却充满了男盗女娼和阴谋背叛，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怂恿达尔维尔夫人背叛她的丈夫，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在秘密结婚以后又生下了孩子。因为小说的情节设置超出了施里加概念演绎的范围，所以施里加对小说情节横加指责，指责两个“绝代佳人”没有按照逻辑演绎的结果行事，也就是没有按照批判哲学的牌理出牌。在施里加看来，小说情节应该服从“思辨的结构”，人的本质应该被理解为理性，作为概念的体现的人就应该克制自己的情欲，因此，违背了理性逻辑的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就是情欲的代表，而这种情欲当中就隐藏着“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马克思进一步通过比较施里加和欧仁·苏关于“爱情的秘密”的阐述方法来揭露施里加概念演绎的荒唐。欧仁·苏主张，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构成爱情的最大魔力，他认为，“爱情要是去掉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

担心、苦恼、困难、秘密、危险，那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或者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1]，但是施里加却在概念演绎的逻辑下曲解了欧仁·苏的原意，认为爱情的秘密不在于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而在于克制情欲。在欧仁·苏笔下，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纯粹是个抽象理智的人，但是施里加却运用他思辨的逻辑把她变成了“情欲”的代表。

在涉及为什么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而英国小说家一写到上流社会往往是描写打猎或乡间别墅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指出，欧仁·苏之所以要利用舞会，只是为了便于把上层的贵族圈子里的人汇集在一起，而且欧仁·苏的这种写法“几乎是所有的法国小说家都喜欢采用的一种手法”^[2]。但是，施里加却根据自己的思辨的逻辑沿着“归天的老沃尔弗的精神”^[3]对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大发思辨之情，他无中生有地认为，之所以要设置舞会这个情节，是因为“跳舞是作为秘密的情欲的最普遍的表现”^[4]，而且“跳舞虽然从外表看起来能够得到快感……但终究不能看做情欲的……接触和拥抱”。^[5]

为了使评论更加符合施里加的思辨逻辑，施里加甚至不惜歪曲小说的情节。在评论中，施里加捏造了塞西莉突然被送入宫廷的情节，并认为“在那里的风俗习惯的强制下，她很快就识破了这些风俗习惯的秘密”，从而把塞西莉塑造成“有教养的社会的被揭露了的秘密”。^[6]然而这种评论完全不忠于小说情节，因为“在小说中，当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第8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巴黎在跳舞的时候，塞西莉正坐在德国的监狱里”^[1]。在小说中，欧仁·苏认为使塞西莉生活放荡的动因是“天生的堕落”，这种放荡的秘密就在于她是一个混血姑娘，“她的情欲的秘密是热带的炽热”^[2]，可是施里加却在其“批判的批判”中非要把塞西莉解读成绝对秘密的生命演绎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可。

马克思通过对《巴黎的秘密》主人公鲁道夫“乔装”出入各种不同场景及其遭遇的评论，对充斥于上流社会的阴谋背叛和声色犬马进行了讥讽，对混血姑娘塞西莉深陷其中的情欲诱惑及其悲剧命运进行了分析。马克思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欧仁·苏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欧仁·苏的文学创作缺陷进行了无情批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对欧仁·苏小说中这些情景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施里加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虚伪性和可笑性，即为了满足思辨哲学塑造各种“秘密”的需要，不惜歪曲欧仁·苏的小说情节和思想。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也阐明了他对婚姻与爱情、理智和情欲等问题的主张和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同时也应该看到，此节（即第三节）也是全书较为晦涩难懂的一节，这种晦涩部分是因为马克思对欧仁·苏和施里加的双重批判容易被混淆，部分是因为马克思对施里加抽象思辨语言的大量引用也妨碍了读者阅读。阅读本节要抓住一个重点，即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施里加用自己的唯心思辨哲学体系来改造欧仁·苏小说情节的错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施里加对欧仁·苏的批判不是基于欧仁·苏本人的文学造诣，而是基于欧仁·苏小说创作不能完全符合思辨哲学的要求。为了完成他的批判，施里加不惜歪曲事实，牵强附会，生拉硬扯，颠倒黑白。马克思对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

这种从理念而非事实出发的文学评论方法非常反感，认为文学评论首先要尊重小说情节，不是要从概念到情节，而是要从情节到概念。正确的文艺评论方法应该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而不是思辨的唯灵论立场。

四 | 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马克思在第四节继续分析和批判施里加运用自己的思辨逻辑来评论欧仁·苏的小说所导致的荒唐结论。

施里加在使“秘密”这个概念离开罪犯世界而隐藏到上流社会之后，继续运用这种概念演绎的手法故弄玄虚。施里加认为上流社会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集团”，这个特殊集团对人民说来是一种秘密。换句话说，施里加用“特殊的集团”和“秘密”这些概念来代替上层社会。因为这种概念演绎完全脱离常识，施里加便运用思辨这种“魔术般的钩子把思辨的论述之链的各个环节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使“这些集团的秘密对人民说来是一种秘密”，也就是不让人理解上层社会的真相。^[1]

同样是在思辨哲学的驱使下，施里加还提出“教养”这个概念，在对于“教养”这个概念生拉硬扯的演绎当中，施里加认为教养“还不能而且也不想把所有的等级和所有的差别都拉到自己的圈子里面来”，认为“只有基督教和道德才能在地球上建立包罗万象的王国”。^[2]实际上，马克思指出，教养所要说明的世界根本就不在概念演绎范围之内，也不在宗教的虚幻世界当中，而在概念演绎之外的现实社会当中，这个现实社会是“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罗万象的王国”，而“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1]马克思认为现实社会即“工业和商业”才是哲学家应该关注的对象，但是这一点根本不被施里加所认可，施里加除了他的思辨唯心主义概念演绎之外什么也不关注。

也是在思辨哲学的驱使下，施里加把小说中的人物雅克·弗兰视为“秘密”这个概念演绎的一个环节，同时用“虔敬”和“正直”这样的概念演绎手法来解释他，认为雅克·弗兰是“正直和虔敬的秘密”。^[2]但是问题在于，雅克·弗兰只是表面上正直和虔敬，他根本不符合施里加所赋予的角色。当巴黎公证人事务所认为雅克·弗兰这个形象是对自己的一种恶意诬蔑并通过戏剧检查的手段从已经搬上舞台的《巴黎的秘密》中删去雅克·弗兰这个角色时，施里加并不与现实的巴黎公证人事务所作斗争，反而是“和概念的空中王国争论”，他把巴黎的公证人看作“宗教和道德、正直和虔敬”，而不是看作现实的巴黎的公证人进行斗争。^[3]他这种概念领域内的斗争当然也不可能起到任何现实作用，这不仅反映了施里加而且反映了所有青年黑格尔分子外强中干的特性。

对于小说中所描述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一起涌向波利多里那里寻找堕胎的方法和杀人的毒药的情形，施里加也将之解读为这些人是到波利多里那里去寻找“一般的秘密”，寻找那作为绝对主体的秘密，来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4]实际上，驱使这些人跑到波利多里那里的根本动机是不可告人的自私虚伪和害人利己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秘密”。也正是在用虚幻的概念演绎替代真实的小说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情节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讽刺施里加用来评论欧仁·苏的小说的方法，“就像我们不找斧子，而找‘一般的工具’，找 in abstrao [抽象的] 工具来劈柴一样”^[1]。在这个意义上，施里加的文艺评论的方法是完全失败的。

施里加评论欧仁·苏小说的方法整体而言十分荒唐，他要求小说情节按照概念的逻辑来运行，最终闹了很多笑话。马克思展开对施里加的批判就是要告诉读者一个道理，即文艺批判的出发点不是纯粹概念，而是实际文本和现实生活，这是文艺评论当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也是文艺评论的“根本问题”和“党性”问题。

五 | 偷窥者皮普勒太太的秘密

施里加大谈抽象的“秘密”概念，看似丰富多彩，实际上除了天马行空的概念演绎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人们无法通过“秘密”这个概念了解欧仁·苏小说所描述的现实生活，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施里加对于欧仁·苏小说的评论。

马克思指出，施里加的概念演绎，只不过是“从它本身是被掩盖着的东西的客体阶段转化为它自己掩盖自己的主体阶段”^[2]而已，施里加的秘密根本就是“不可捉摸”和“不易揭露”的概念，读者并没有因为这种概念演绎而获益，相反，通过施里加的解读，读者的困惑似乎增加了。因此，为了走出自己在思维上的死胡同，施里加不得不勉强从思辨领域走向经验领域。马克思说，施里加“从高踞于抽象云雾顶上的宝座中的秘密这一绝对主体的高峰跳到看门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

所住的地下室”^[1]，把仆人和看门人皮普勒及其妻子描写为“绝对的秘密的体现”，认为“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用某种方式开始了反秘密的游击战”^[2]，赋予偷窥者皮普勒以揭示秘密的重大使命。施里加之所以将皮普勒及其妻子描写为“绝对的秘密的体现”，是因为在施里加看来，皮普勒夫妇作为仆人和看门人的角色“地位比较独立和没有利害关系”^[3]，这使他们能够得到在门后偷听秘密的便利，而这个角色就使得他们能够承担起揭示巴黎的“秘密”的使命。

马克思在这里批驳了施里加的三点错误。第一，施里加认为看门人“地位最有利”、“比较独立”和“没有利害关系”的判断并不正确。马克思指出，在偷听秘密这一点上，比看门人地位更有利的是警察。而且，马克思认为，看门人也并不独立和无利害关系，实际上，巴黎的看门人往往成为房东的代表和密探，他们还会以秘密警察的代理人身份捞外快。这种情况在很多艺术作品当中都有描述。第二，施里加的评论也与欧仁·苏的小说情节不一致。欧仁·苏根本就没有把皮普勒太太描写成“不计利害的”和心地善良的人，小说中的皮普勒太太贪婪、恶毒、吝啬、小气，根本就不具备施里加所赋予她的“独立”和“无私”的特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揭示了施里加治学态度上的虚伪，也就是说，当施里加发现纯粹的思辨不能发现“巴黎的秘密”之后，他丝毫也不在乎背叛自己的思辨逻辑，放弃纯粹思辨，通过门外偷听的耳朵来发现“绝对的秘密”。马克思认为，施里加的抽象思维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根本就揭示不了任何秘密，在这个意义上，他讽刺地将施里加的抽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页。

象思维称为“神灵似的辩证法”^[1]。

马克思在这一节以讽刺的方式痛打落水狗，通过对比警察、仆人、看门人、看门人妻子、房东等不同身份人的特征差异，层层揭露了施里加对《巴黎的秘密》评论中体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针对施里加对看门人“运气不佳”的“安慰性”解释，马克思报以辛辣嘲笑，“使他遭到失败的秘密就是人家对他的讥讽和嘲笑”^[2]，暗示施里加所贩卖的各种秘密之所以荒唐和可笑，其秘密正是“人家对他的讥讽”。这也正是本节名为“秘密—讥讽”的原因。

六 | “斑鸠”——丽果莱特的秘密

在施里加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当中，“秘密”作为最根本的范畴决定着整个评论过程。由于思维的抽象性，“秘密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纯滑稽戏的地步”，对此，施里加仅仅要求“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3]在这一节里，马克思重点分析了施里加所卖弄的“思辨的滑稽戏”^[4]的本质。

马克思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施里加所卖弄的“思辨的滑稽戏”。当有人提出问题要证明人是动物的主宰时，思辨的解答步骤就是这样的：思辨哲学家首先颠倒具体动物和一般动物的关系，将一般动物概念不是作为具体动物的抽象，而是作为真实存在的实体，他们认为具体动物都是一般动物概念演绎而来的。为了证明人能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征服动物，思辨哲学家不会让这个“一般动物”演绎为狮子和鲨鱼，因为狮子“会把人撕得粉碎”，鲨鱼“会把人吞下去”，而是有选择性地让“一般动物”演绎为哈巴狗，当人类能够征服哈巴狗，也就证明了人能够征服“一般动物”。但是施里加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显得滑稽，正是因为当他让“一般动物”演绎成哈巴狗时，这只哈巴狗的吠叫仍然能让一些“小孩或孩子气的人”看见了就逃跑。于是施里加认为，应该“向哈巴狗挥动……竹杖”，以此证明人类通过征服哈巴狗而成为“一般动物”的主宰。^[1]

按照同样的思维逻辑，施里加让小说中的人物“斑鸠”通过皮普勒和卡布里昂而战胜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的秘密”^[2]，而实际上，施里加认为“斑鸠”本身就是“秘密”这个范畴的体现，只是“斑鸠”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里加认为“‘斑鸠’在这一步上做得不能再纯朴了”^[3]。

马克思在这一节批判了思辨哲学荒唐的思维方式和这种思维方式所必然导致的滑稽的结局。所谓滑稽，也就是脱离常识，施里加的思维之所以显得滑稽，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思维根本和现实生活不搭界。

马克思在这个部分同时批评了欧仁·苏在“斑鸠”这个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的问题。欧仁·苏塑造的“斑鸠”形象在前后两个阶段截然不同，前期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浪漫女子”^[4]，在她身上，欧仁·苏描写了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和她与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系，都使得她和那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页。

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可是在后期，欧仁·苏出于“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1]的秉性，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使之符合资产阶级的文学口味。马克思认为这种取悦资产阶级和违反现实生活常理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是不应该的。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艺术人物塑造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要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和现实生活的常理来塑造人物，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喜好来塑造人物，欧仁·苏显然选择了后者，所以他所塑造的“斑鸠”这个人物，刚开始是成功的，后来则是庸俗的。

⑦ | “巴黎的秘密” 当中蕴含的世界秩序

在其思辨哲学的指引之下，施里加不仅认为作为抽象概念的“秘密”是巴黎的秘密，而且是世界的秘密。这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当中蕴含着“世界秩序”。如果说《巴黎的秘密》是思辨哲学的“批判的史诗”的话，那么思辨哲学就是《巴黎的秘密》的“哲学上的再现”。因此，施里加说：“这一秘密的世界也就是‘巴黎的秘密’的个人活动得以进行的普遍世界秩序。”^[2]也正是在思辨哲学作为“世界秩序”的意义上，施里加认为具体事物的秘密统一于整个世界的秘密，统一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施里加说：“这些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自身组成许多环节的有机的连贯性，而这些环节的总和就是秘密。”^[3]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在施里加看来,这种“世界秩序”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发现的。施里加说:“在我们的史诗中,秘密并不表现为这种自知的连贯性,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并不是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批判机体,而是一种神秘的植物的存在。”^[1]这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只有批判哲学家们能够发现“世界秩序”,在小说中,只有思辨哲学的代理人鲁道夫才能发现“世界秩序”。正是因为“秘密”或者“世界秩序”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发现,因此秘密才“促使任何坚强的人进行独立的检查”^[2],这个“坚强的人”指的就是施里加一伙或者小说中的代理人鲁道夫。揭露秘密的重担于是就落在鲁道夫的身上,只有鲁道夫才能将“神秘的植物的存在”转化为“批判的批判的机体”中的“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环节”,^[3]也就是认识秘密,认识“世界秩序”。

马克思在第五章最后一节指明,批判哲学家施里加一伙的理论目的,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彻底认识“世界秩序”的英雄,意图通过构建批判哲学的世界图式来达到“翻转乾坤”的结果。事实证明,以施里加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家的认识是荒唐的,他们自命不凡的自我期许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他们只能做思想上的“英雄”和行动上的矮子。

在《神圣家族》第五章,马克思围绕施里加所贩卖的各种“秘密”进行了层层揭露和驳斥,使施里加的思辨唯心主义真面目得以充分显现。马克思虽然以“驳论”为主,鲜有对唯物主义的正面阐述,但是,马克思在批驳论敌时所体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这种驳论方式也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开始对这部书的设定：“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第九章

布鲁诺对群众的『三次征讨』

《神圣家族》第六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由马克思主笔，恩格斯仅仅参与撰写了该章第二节“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的第一个小问题“(a) 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在这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火力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布鲁诺展开批判。布鲁诺·鲍威尔作为顽固的思辨唯心主义者，坚持认为历史是以他为核心的批判精神所创造的，极力抹杀群众在历史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布鲁诺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标靶，将布鲁诺对人民群众重要历史地位的恶意攻击总结为“三次征讨”，并以此为线索批判其英雄史观，初步探讨群众史观的基本原则。

一 | 布鲁诺对群众的第一次征讨

(一) 布鲁诺英雄史观的错误实质

马克思认为，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所有成员中，布鲁诺·鲍威尔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比如埃德加尔、赖哈特、法赫尔等人）仅仅是以“相对的批判”的身份去贬低和否定“某些群众的事物和人物”的话，那么布鲁诺·鲍威尔则以“绝对的批判”的身份去贬低和否定“全体群众”。^[1]布鲁诺之所以肩负如此重任，是因为“绝对的批判必然是绝对的个体”，而这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

个“绝对的个体”就是布鲁诺本人。^[1]

布鲁诺毫无疑问是青年黑格尔派英雄史观的集大成者。在布鲁诺看来，整个历史都是批判精神的异化，历史活动的本质既不是群众活动也不是社会生活，而仅仅是寓于群众和社会生活之中的批判的“观念”。这样一来，作为批判精神的人格化身的批判哲学家就是历史的创造者。既然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一小撮思辨哲学家，人民群众在历史当中的作用自然就无足轻重。群众只是无知群氓，只有批判哲学家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马克思认为，布鲁诺的英雄史观与黑格尔哲学密切相连。一方面，布鲁诺继承了黑格尔的基本思维方法，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抽象逻辑自我演绎的过程。另一方面，布鲁诺又将黑格尔的思维逻辑推向极致。在布鲁诺看来，黑格尔哲学存在双重不彻底性，一是黑格尔尽管已经宣布绝对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又不肯宣布创造了绝对精神的哲学家就是他本人；二是黑格尔仅仅是在历史事实之后在幻想中认为绝对精神是历史的本质，但并没有明确宣布绝对精神创造了历史。布鲁诺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双重不彻底”。第一，他宣布他自己就是绝对精神，以他为代表的一小撮批判哲学家作为“杰出人物”就是批判精神的化身。第二，他认为批判哲学不用在历史之后证明自己，而是要主动创造历史。于是，思辨精神创造历史，思辨哲学家创造思辨精神，“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2]正是在黑格尔哲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布鲁诺认为“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3]而已。马克思指出，布鲁诺的批判哲学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页。

实质上是一种目的论哲学，正如植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一样，历史和群众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给批判哲学“充饥”。人类历史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作为绝对真理的批判精神。也正是因为批判精神是一种脱离群众和现实的主观性存在，它也就沦为一种空洞虚无的存在。马克思说，既然批判哲学“是以太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这样，它就“丧失了它全部的精华、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成了淡而无味的东西”。^[1]

批判哲学极力推崇精神在创造历史当中的决定作用导致批判哲学极端蔑视群众的历史地位。在“批判的批判”看来，群众仅仅是“一锅不纯的稀粥”^[2]，应该用“纯批判”加以批判。事实上，布鲁诺就是在“绝对批判的英明和绝对群众的愚蠢的关系”^[3]的思辨框架下来思考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布鲁诺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4]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哲学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进一步认为：“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布鲁诺所阐发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式的完成。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在批判了布鲁诺英雄史观的反群众本质之后，马克思第一次正面论述了群众在历史创造当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历史上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不成功，并不是像布鲁诺所说的那样唤起了群众的热情，而是因为这些活动所唤起的群众热情不够。因此，思想一定不能离开具体的物质利益，不能离开群众的参与，“‘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马克思以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决定历史的不是批判精神，而是群众的物质利益，“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3]。

马克思通过对布鲁诺英雄史观的分析对批判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以及布鲁诺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进行了透彻的阐述。马克思在这一节完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树，即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阐明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历史发展的源泉，这是后来成型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

（二）布鲁诺在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错误及其思想根源

1842年底，布鲁诺在《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上发表了论文《犹太人问题》，1843年3月，他把该文扩展成小册子在布伦瑞克出版，同年7月，他又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发表了《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系统地表述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布鲁诺论述犹太人问题的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列文章问世之后，遭到理论界（如菲利浦逊、希尔施等人）的广泛批评，这其中就有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对于这些批评，青年黑格尔派和布鲁诺根本不以为然，青年黑格尔派把“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看做绝对的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1]。布鲁诺在对这些批判性评论的回答中，“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点，反而肯定它发现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2]他甚至声称，“那些由于自己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多么伟大的群众的辩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贫乏”，^[3]从而把矛头直接对准马克思。

在犹太人解放这个当时世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布鲁诺的基本观点是：宗教是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源，如果犹太人要求在基督教国家中享有和基督徒平等的权利，就要承认基督教，换言之，如果犹太人不放弃犹太教的“特权”，就应该忍受基督徒的特权，因此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寻求犹太人的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犹太人的解放只能通过消灭宗教而实现，当每个人都因消灭宗教而获得解放，那么犹太人也就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以菲利浦逊和希尔施对布鲁诺的批评以及布鲁诺对自己的辩护为例证，进一步证明布鲁诺在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荒谬性。

基于布鲁诺把国家和人类、人性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并且通过精神解放的方式实现政治解放的策略，菲利浦逊认为，布鲁诺在思索的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页。

的哲学理想”^[1]而已。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布鲁诺的辩解和他先前的观点没有本质区别，“仍旧把取消宗教、把无神论看做市民的平等的必要条件”^[2]，也就是说，认为犹太人的解放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而不是基于现实社会关系上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布鲁诺一伙的这种思维方式再精妙，也不过是在精神领域转圈子，它避开实际的物质生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这种思维上的抽象演绎不过是思维的自问自答、自欺欺人和自以为是，只不过是黑格尔式的“思辨戏法的重演”而已。^[3]

（三）布鲁诺批评辛利克斯的具体表现及其错误实质

1843年，老年黑格尔派分子辛利克斯的《政治讲义两卷集》在哈雷出版，布鲁诺分别在《文学总汇报》第1、第5两期发表对辛利克斯两卷本的评论。布鲁诺为了逃避关于其思维方式具有主观主义的指责，坚持认为自己在思辨领域的“政治运动具有社会的意义”^[4]，坚持“把自己的神学工作叫做社会的工作”^[5]，但是批判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实质并不因为它使用“社会的”标签来标榜自己而有所改变，这种文字游戏并不能改变批判哲学只不过是在“纯粹神学的”思维框架内打转转的本质。布鲁诺为了摆脱自己与黑格尔哲学的牵连，“硬给辛利克斯安上了一个‘真正的黑格尔派’的头衔”^[6]，以此证明批判哲学自身已经完全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特征，但这种努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是徒劳的。

应该承认，马克思在本节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神圣家族》写作上缺乏斟酌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辛利克斯都说了些什么并没有详细交代，甚至引文都是只词片语，这让读者既无法完全了解辛利克斯的思想原貌，似乎也难以辨别布鲁诺的主要观点。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有意识地在“断章取义”，原因可能是马克思急于在这本书中驳倒批判哲学，这决定了他们不太在乎文本的结构和语句的推敲，这也是造成这本书理解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 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一）批判布鲁诺低估费尔巴哈冲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布鲁诺驳斥辛利克斯的第二号论文称为“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布鲁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一贯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这个事实，转而通过猛烈冲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方法妄图摆脱黑格尔体系，他们通过提出所谓“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以及“人的意义”等概念徒劳地反对黑格尔哲学，并信誓旦旦地声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秘密”在批判哲学中“已被揭露”。^[1]但是，恩格斯认为，批判哲学的这些努力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真正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秘密的不是批判哲学，而是费尔巴哈。恩格斯在这里少见地用了几个排比句反复申明费尔巴哈的“天才发现”对于颠覆黑格尔思维方式的重大意义：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1]

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而不是批判哲学所说的概念。“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 布鲁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远远低于费尔巴哈的水平，费尔巴哈已经“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但是批判哲学却“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从而开了历史的倒车。^[3] 批判哲学仍然满足于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直截了当地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者、是无限的，相反地把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恩格斯指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唯一目的就是促使“基督教德意志的精神”获得胜利。^[4]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推崇费尔巴哈，认为费尔巴哈完全超越了黑格尔，他们丝毫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理论的内在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对于费尔巴哈如此推崇，可能是因为经历了《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和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恩格斯已经深深地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第11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

认识到了黑格尔唯心思辨哲学的腐朽和落伍之处，他们急切地想通过贬斥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方式与这种哲学思维划清界限，而费尔巴哈哲学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某种思想武器。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认识到费尔巴哈的不足之处，没有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予以揭示，但是在实际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已经开始明确超越了费尔巴哈。恩格斯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不像费尔巴哈那样用宗教思想的演变来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而是用具体的人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为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认清费尔巴哈的思想局限奠定了基础。

（二）批驳布鲁诺论证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唯心主义实质

针对里谢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责难，布鲁诺在《文学总汇报》第4期发表了为其犹太人解放论点辩护的第二篇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布鲁诺老调重弹，继续强调犹太人解放的根本还在于思想解放。他声称：“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2]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给予了严肃的批判：“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第11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

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1]

在布鲁诺看来，批判就像上帝一样神通广大，只是这种神通仅仅体现在思辨范围之内，甚至思辨所遭遇到的外来“反抗”也是由批判哲学自己设定的。这就是说，批判决定了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对对象的批判仅仅是批判的自我批判而已。在对犹太人解放这个问题的分析上，布鲁诺根本就不愿意超出纯粹思辨的范围，不愿意走向真实的生活世界，仅仅愿意在思辨的狭隘范围内理解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布鲁诺指责他的论敌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批判哲学，实际情况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正是布鲁诺本人。布鲁诺“绝不会去研究犹太人对待现代市民社会的真实态度”^[2]，他认为国家对于犹太人的排斥只是对于犹太人对于国家的排斥的报复，“国家仅仅是由于犹太人排除国家，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国家中排除出去，所以它才排除犹太人”^[3]。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诺所论证的犹太人解放问题完全是在思辨领域实现的，而不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实现的，布鲁诺的“社会就是批判的天堂，而真正的世界却被作为非批判的地狱从那里驱逐出来”^[4]。

此小节内容比较难懂，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里谢尔和布鲁诺争论的具体背景及内容没有交代清楚，这影响了读者对文章所引用字句的理解。其次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上还有大量思辨语言的残留。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批判哲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们甚至故意使用黑格尔式的语言。比如，马克思的这个表述，“如果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5页。

对辛利克斯先生来说，批判的解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社会的’ + ‘社会的’ + ‘社会的’ = $3a$ ，那末，绝对的批判在其第二次征讨中就是从加法转到乘法，而里谢尔先生则委身于自我相乘的社会，委身于社会的平方，即社会的社会 = a^2 。绝对的批判为了做出它的关于社会的结论，它只得转到分数上去，开始求社会的平方根”^[1]，让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三 | 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一）思辨领域的昂首阔步遮盖不了现实领域的苍白无力

批判哲学居高临下俯视一切事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它的批判对象。对于布鲁诺而言，批判哲学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批判消弭批判哲学与一切事物以及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为了消弭这一鸿沟，批判哲学首先要“清除它本身的群众性”^[2]，甚至清除创作批判哲学的“活生生的历史的人”^[3]，这是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在布鲁诺看来，是纯粹的思维决定了历史，而不是历史决定了思维，他们大声疾呼，“哪一个历史时代不是由威严的‘笔’预先规定了的，不是应当由笔来解决其存在问题的！”^[4]但是讽刺的是，甚至布鲁诺也承认，迄今还没有一个历史时代是被批判哲学的“笔”所认识的。马克思反问，既然这个规定历史发展的“笔”都没有认识以前的时代，又凭什么能够预知所有的时代呢？

自命不凡的批判哲学家自我标榜为“绝对的、完善的、纯粹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第12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的”^[1] 批判，他们根本不愿意与群众打成一片，批判哲学家认为如果真正地和群众打成一片，“那末绝对的批判在其启示中就不再是绝对的，因而它会招致致命的侮辱”^[2]。但是绝对批判的悲哀就在于，绝对批判的努力根本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批判哲学在现实生活中举步维艰，这导致绝对批判不得不接受群众，走向现实的政治活动。绝对批判说，“它的努力简直不被人重视，况且，批判还有个时期曾不得不诚恳地考虑敌人的前提并暂时认真地接受它们”^[3]，这就是说，批判哲学暂时向群众做了妥协。为了化解这种理论上的尴尬，批判哲学一方面归罪于群众的局限性，一方面归罪于批判哲学，认为批判哲学还没有能力完全打消关于批判的事业和群众的事业具有一致性的幻想。这也就是说，迫于现实，批判哲学“还不能在外部跟群众分裂，但是这种分裂却已经在它的内部，即在它的灵魂中形成了，而且是在它诚恳地同情群众的时候形成了！”^[4] 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哲学的反群众立场是根深蒂固的，它和群众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

鲍威尔的批判哲学看似超越了黑格尔，但依然是黑格尔哲学的可怜翻版。批判哲学这种高度思辨的高高在上的特征决定了它不食人间烟火的外在表象。马克思指出，批判哲学必须永世地研究思辨神学，因为批判哲学家实际上就发挥着职业神学家的实际作用。批判哲学之所以也屈尊卷入群众的政治关系当中，既与批判哲学家的政治野心有关，也与他们维护宗教统治的客观效果有关。比如说，在鲍威尔的神学研究当中，尽管在宗教批判当中竭力把“耶稣”跟他的“原则”分开，但是鲍威尔把主耶稣及其原则的“创造”力描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述得有声有色，以致于他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和“精神”竟成了基督教的创造物。鲍威尔的研究并不限于神学，而是要进一步延伸到政治领域，但是批判哲学一旦把研究领域延伸到政治，一旦面临现实生活，它就会发现“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造成了批判的政治上的弱点”^[1]。批判哲学本身就不明白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批判根本没有跟它的真正的因素发生过矛盾，没有跟自己发生过矛盾”^[2]。结果，批判哲学试图干预现实却缺乏有效手段，批判哲学进行自我辩护却苍白无力。这就是马克思所揭露的批判哲学的“昂然阔步所用的高跷”和“整个智慧所仅有的把戏”^[3]。

马克思在这一小节主要分析了批判哲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不食人间烟火的批判哲学进行的抽象思辨高高在上，这使得批判哲学家完全缺乏干预现实的意愿。另一方面，思辨哲学对群众的鄙弃和对政治活动的不屑，让它缺乏干预现实的手段。纯思辨领域的昂首阔步遮盖不了现实领域的苍白无力，这就是批判哲学的尴尬之处。

（二）批判布鲁诺宗教和国家观的唯心主义本质

如前所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曾经发表过一篇对布鲁诺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进行驳斥的评论《论犹太人问题》，批评布鲁诺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仍然没有完全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维方式，因此“没有对旧的犹太人问题提供‘正确的提法’”^[4]，但是，它毕竟指出了布鲁诺的错误。在布鲁诺看来，犹太人解放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问题，只要犹太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

放弃自己的犹太教，尊崇基督教，他们就可以获得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布鲁诺所提出的解放仅仅是政治解放，即犹太人获得和基督徒相同的政治权利而已，真正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解放，更应该是人类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寻找途径。换句话说，“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1]。布鲁诺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不用犹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来解释犹太教的本质特征，而是相反，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也就是用犹太教精神去解释犹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马克思结合犹太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真实处境来解释犹太教和犹太人的生存状态，认为：“只要剥掉掩盖着犹太精神实质的宗教外壳，掏出犹太精神的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就能够规划一个消溶这种内核的真正的社会形式。”^[2]而布鲁诺却完全局限在“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的思维小圈子当中。^[3]马克思指出，犹太精神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布鲁诺完全没有认识到，“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4]。布鲁诺之所以不能发觉这一点，是因为他坚持抽象思辨的原则而不知道犹太精神是现实世界的一环，而只把它当作他的世界即神学的一环。在这个意义上，犹太精神的产生是当代市民社会的必然产物，“犹太精神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能达到完备的程度”^[5]，犹太人的解放也只有在现实的市民社会当中去寻找。“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第141页。

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1] 这也就是说，“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2]。犹太人的解放不在思想领域，而在市民社会领域，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诺是一个“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神学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的圈子之内进行活动”，甚至把整个世界都归结为宗教的“神学狂”。^[3]

马克思还认为，布鲁诺所追求的政治解放仅仅在德国适用，实际上在很多“现代国家”，犹太人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也就是说，犹太人已经享有和基督徒相同的政治地位。布鲁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罔顾德国专制政治这一非“现代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国家、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设想成绝对的基督教国家”^[4]。事实上，德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而是一个充满着特权的不民主国家，在这样的国家，犹太人的解放根本不可能。犹太人即使获得了和基督徒一样的政治权利，犹太人和基督徒也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做公事而当做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5] 因此，在德国这种基督教特权国家，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布鲁诺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布鲁诺之所以仍然坚持在宗教解放当中寻求人的政治解放，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还是因为布鲁诺坚持用宗教解放的方式实现政治解放的基本思维路径。鲍威尔认为，“国家是批判神学的心愿的执行人”^[1]，“国家仅仅是消灭‘批判’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工具”，^[2]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利用国家来实现宗教的解放。布鲁诺在其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里透露了把自己树立成国家的批判家的野心，这样，布鲁诺的保守面目就暴露无遗。马克思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结果，“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3]。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观点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就法国革命问题进一步批判布鲁诺的阶级与国家观

布鲁诺毫无例外地用纯粹思辨的方式分析法国革命，毫无例外地批判群众和鄙弃物质生活。马克思批评说，在纯思辨领域探讨法国革命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启示。“当批判断言民族主义促使法国革命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见解。同样，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规定为纯洁的利己主义，这也没有说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4]在马克思看来，要理解社会，必须深入到对市民社会，深入到对人的物质需求的考察中来，因为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利己主义的人”^[5]。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法国革命的思想超出了法国“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1]，在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思想领域当中，法国的革命者构造了新世界秩序。布鲁诺在对法国革命思想的评论当中，认为这种革命思想应该通过最大程度承认国家和民族的秩序来限制利己主义，但是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这种通过鄙弃物质利益，通过纯粹思辨和概念演绎的方式所实施的革命终将被历史所抛弃。马克思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也就是说，纯粹的思辨根本不能改变现实的物质生活，而这种改变不能依靠思辨哲学家，只能依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不是批判哲学所设想的自我满足的个人原子，而是从事着物质生活，追求着个人私利的个人，因此，“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3]。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4]。

马克思通过列举法国革命的事实来证明思想和物质生活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宣称，政府的根本原则是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将在共和的法兰西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来。”^[5]圣茹斯特也天真地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页。

认为自由、正义、美德能够挽救法国革命。马克思认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想“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1]，他们忽视了决定着社会根本面貌的市民社会。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有所不同，“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2]。因此，正是因为拿破仑认识到了国家的基础的重要性，所以他不是一个空想的革命家，“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3]。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4]，因此“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5]。比如说，拿破仑曾经限制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自己的土地，他曾经试图通过国家政权来支配商业，都伤害了资产者的利益，拿破仑根本不顾及他的政治野心同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这决定了拿破仑事业的最终覆灭。法国革命只是发展到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才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争得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在资产阶级看来，国家就是资产阶级“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6]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页。

在这里，马克思基本上完整地表达了思想和市民社会、阶级与国家以及阶级与阶级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术语上并不明确，但是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明确的，这些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日后建立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本小节，马克思的写作特征得到突出表现，即并不拘泥于遵循严格思维逻辑的跳跃性文笔。马克思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论述完毕，就一下子跳跃到另外一个问题的阐述上了，这种写作方式既体现了敏锐快捷的思维优势，也客观上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

（四）批判布鲁诺对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曲解和贬低

在本小节，马克思仔细梳理了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并指出批判哲学由于受制于自己思辨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极力反对英法特别是法国由斯宾诺莎所奠定并持续发展的唯物主义传统。布鲁诺为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故意赋予法国唯物主义传统一种“愚钝的命运”^[1]，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淹没在浪漫主义里”^[2]并注定灭亡。实际上，马克思指出，批判哲学在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用思辨的逻辑评价法国唯物主义，这不但不能证明法国唯物主义的失败，反而证明了思辨唯心主义的荒唐。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史，通过把“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跟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做一个对比”的方法，证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在实际演变的历史与按照‘绝对的批判’……的命令而演变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3]

马克思如此评价法国唯物主义：“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1]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2]。马克思认为，笛卡儿^[3]不仅是法国唯物主义的源头，同时也是法国形而上学的源头，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到了18世纪初，实证科学就通过给自己划定单独的研究范围而脱离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尴尬地演化成思辨的想象了。马克思认为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发现形而上学其实是神学的避难所，他证明了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的，他编纂了形而上学的灭亡史，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也正是他启发了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斗争。

马克思在高度评价洛克和培根的唯物主义之后，认为“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4]。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之所以在霍布斯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这是因为霍布斯之后的唯物主义者把培根所开启的唯物主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3] 笛卡儿，近代哲学的创立人之一。引文中作“笛卡儿”，系新旧译法用字不同。——编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原则发展到极致，“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1]。在霍布斯之后的唯物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2]。这种绝对的唯物主义对于铲除因唯物主义原则不够彻底而产生的“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和“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哲学藩篱”起到了重大作用。^[3]但是霍布斯在把培根的原则系统化之后，也致使唯物主义形成“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这样一种使唯物主义成为反人性的东西的局面，自此之后，“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4]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霍布斯的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5]。在这里，马克思高度赞扬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天然联系。

在本小节，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了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赞扬了费尔巴哈批判形而上学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实际上，马克思在提到黑格尔的时候，用语还是相当恭敬的。马克思甚至说到了“黑格尔天才地把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4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4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5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4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0 页。

的王国”^[1]这样对黑格尔满心崇敬的话语。既然马克思的这本书以批判思辨唯心主义为目的，而这种思辨唯心主义又以黑格尔为理论源头，为什么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的时候并不使用像对鲍威尔兄弟的那种轻蔑的语气而是用这种崇敬的语气呢？同样的理由，马克思在赞扬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有保留，这就是马克思在认可唯物主义对于反对形而上学的功绩之后，认为洛克和培根的唯物主义散发着人性的微笑，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则变得敌视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和霍布斯两人的态度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朦胧地认识到唯物主义也应该给人类精神以适当的位置，彻底否定人类精神的唯物主义并不可取，这种朦胧的思维发展到后来，就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做了前期理论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本部分马克思在提到费尔巴哈的时候，是完全推崇毫不怀疑，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备了人性的复归，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有赖于科学实践观的产生，但是在本书当中，马克思尽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但是这个实践还不具备科学实践的含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如此之高，实际上也与马克思此时正处在思想革命时期而同时这种思想革命又尚未完成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热情洋溢的赞扬，值得我们深思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五）批判布鲁诺在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关系上的错误

布鲁诺铲除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的办法，就是将之一概斥为“幻想”。布鲁诺在用这样的手段鄙弃了国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之后，也用同样的手段来贬斥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义思想。布鲁诺仍旧用精神的演变逻辑来批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认为“德国的启蒙者犯下了反对神圣精神的罪过”，因为如果“精神的存在物不改变，它就不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1]。但是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决定了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是“下层阶级”的“实际生活”，“即使没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2]布鲁诺把群众设计成精神的绝对的敌人，在批判哲学的思辨体系当中，群众仅仅是原料而已，而历史则是精神运动的产品。在布鲁诺看来，德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这个社会运动遭到了群众的亵渎。因此，批判哲学的理论研究只不过是在努力清除“被物质所亵渎的精神”和“被群众所亵渎的批判”^[3]而已。马克思指出，这种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思辨哲学体系的最终结果仅仅是把布鲁诺及其伙伴与“作为物质的所有其余人类”^[4]相对立。

马克思比较详细地谈论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马克思主张在市民社会当中寻找原因，在“下层阶级”的物质生活当中寻找原因，因而确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关于“下层阶级”“市民社会”等概念的提出，也有利于他们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在理论草创时期提出的概念虽然不够严谨，但是这种概念的提出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奠基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页。

(六) 批判布鲁诺的思辨循环和神学本质

马克思指出，施特劳斯和布鲁诺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是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范围内的争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施特劳斯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布鲁诺则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极端地发展了黑格尔哲学并在此立场上批判黑格尔。布鲁诺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幻化为黑格尔的精神，然后又把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幻化为独立的主体，从而完成了创立绝对唯心主义的过程。布鲁诺一伙以继承黑格尔的事业为己任，认为自己的哲学就是“特定体系的最后业绩”^[1]，实际上鲍威尔的哲学只是黑格尔哲学的可笑模仿。马克思指出了批判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本质，指出批判哲学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2]，这种“‘完善的’和‘纯洁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3]。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哲学，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终结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没有片面地把黑格尔的某一个部分极端化，而是在超越作为黑格尔哲学有机成分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发现了作为前两个因素统一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4]。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费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尔巴哈“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并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

马克思指明批判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思辨的创世说”^[2]，而布鲁诺是一个“神学家”^[3]。批判哲学“在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自己跟实体的对立”，批判是批判哲学的武器，批判哲学“用这个武器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有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切，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4]也正是利用这种思辨唯心主义，鲍威尔把自己幻化成思辨，把思辨作为自己的化身，这样一来他就确立了自己不仅在思辨哲学而且在世间一切事物当中的教主地位。当“对鲍威尔先生的新旧著作的辩护代替了对新旧约全书的辩护”，当“神与人、精神与肉体、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精神、批判或鲍威尔先生与物质、群众或世俗世界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宗教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5]

马克思在本小节对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这种深刻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并不是在完全意义上否定黑格尔，他认识到了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当中隐含着斯宾诺莎的成分，即唯物主义的成分，并且认为黑格尔哲学所推崇的绝对精神实际上指的是现实的人及人类社会，这是一个超越当时所有黑格尔研究者的惊人的发现。其次，马克思高度推崇费尔巴哈，是因为费尔巴哈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了黑格尔的人本主义而不仅仅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如果费尔巴哈仅仅有唯物主义，那么他并不值得享有如此尊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盛赞费尔巴哈，实际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页—第182页。

上还是因为费尔巴哈提倡的是“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可能蕴藏着将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辩证法。有道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也没有发现科学的实践观，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也在逐渐完善中，一旦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科学的实践观，一旦唯物史观最终树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立刻发现费尔巴哈的“人道的唯物主义”徒有其名，就会立即发现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特征，费尔巴哈也就会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亲手为他搭建的神坛上跌落下来，他们再谈到费尔巴哈时的用语也就不会那么恭敬有加了。

第十章

批判哲学及其记者自导自演的滑稽剧

在《神圣家族》第七章，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批判哲学的大本营《文学总汇报》及其遍布欧洲的记者们。

一 | 批判哲学及其记者自娱自乐的可笑戏剧

批判哲学宣布自己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对立面，而群众作为批判的材料，仅仅是为了证明批判精神的无上光荣而存在，因此，批判哲学宣称，“它同群众的关系是现代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1]。马克思认为，宣称自己是群众的对立面，宣称自己的存在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并不意味着群众认可。批判哲学为了营造自己作为“绝对的主体”来批判世界的假象，需要有人扮演群众的角色对它顶礼膜拜，于是，扮演群众对批判哲学顶礼膜拜的任务就由《文学总汇报》分布在欧洲各地的记者们来完成。正是在这一幕“批判的批判”与“批判的群众”联袂上演的情景剧中，批判哲学及其信徒蔑视群众的不可一世态度暴露无遗。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批判的群众”专指《文学总汇报》分布在欧洲各地的记者们。这些记者作为批判哲学的信徒，盲目相信作为绝对主体的批判精神“是唯灵论的主宰”^[2]，他们推崇批判精神纯粹的自发性而鄙弃现实生活，鄙弃群众，他们不能容忍任何来自现实生活和群众对批判精神的干涉。正是在批判哲学的影响下，这些记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页。

者（采尔莱德、弗莱什汉默尔、希采尔等人）用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模式来写稿，认为所有存在都是批判精神外化的结果，都是可以批判精神理解的存在，这些记者“崇拜批判的批判的绝对的理解力，甚至硬说它能理解那些根本无从理解的事情”^[1]。他们声称，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被批判精神所预设和决定，任何奇怪的事情在批判精神的意义上都并不奇怪，因此“他们为了应付一下而向批判的批判报道的消息，都是它早已知道、洞悉、认识、理解和体验到的”^[2]。

这些记者面对群众和事实的骄横狂妄与他们面对批判哲学的谦恭卑微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甚至连向批判哲学的大本营《文学总汇报》投稿都感到歉意。面对批判哲学，他们诚惶诚恐，胆战心惊，生怕他们的报道误解了批判精神的精髓。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报道的所有事实，在他们无比崇敬的批判哲学看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仅仅是为了证明批判精神的正确性，仅仅是为了让批判精神做最后的评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评价这些“记者的阅历不外是执行和证实批判的预言”^[3]。与记者们的谦恭卑微同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批判哲学家们的自大和傲慢。以鲍威尔兄弟为首的批判哲学家自以为正义在身，真理在手，要求“外省”的记者给他们写通讯稿证明批判哲学的真理性。在批判哲学家们看来，所谓“外省”并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专指那些批判哲学还没有普及的荒蛮之地。“批判的外省人只有躬身谢罪之后，才敢斗胆请求批判的最高当局予以注意。”^[4]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6页。

为了进一步说明批判哲学所导演的这一幕理论闹剧对记者们思想的侵蚀和败坏，马克思特意列举了驻苏黎世的记者希采尔。马克思指出，登载在《文学总汇报》上的所有希采尔的通讯不外就是这么一套批判的言辞，如“群众较之批判的蠢笨无能、性情鄙劣、懦弱、冷酷、畏缩、狂暴、凶狠”，“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对抗而使批判变得更尖锐更机警的群众”。^[1]希采尔责备群众仅仅满足于“主张”“善良的愿望”“言辞”“信仰”等等，但是他自己身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却满足于表达他的“批判的主张”“批判的信仰”“批判的善良愿望”的言辞，并且鼓动布鲁诺及其伙伴去“行动、工作、战斗”和“创造”。^[2]马克思指出，批判哲学的记者们热衷于描绘批判哲学的思辨图式实际上“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批判哲学家和批判哲学的记者们围绕《文学总汇报》制造这个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精神王国，这仅仅“证明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仆的固执的念头”。^[3]

马克思最后指出，批判哲学所制造的闹剧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批判的记者们光是用批判的言语向神圣家族‘祈祷’并同时向群众念‘咒语’”。^[4]批判哲学要想真正影响现实，“必须要有非批判的群众的记者，必须要有群众派往批判的批判的真正的使节”。^[5]这也就是说，记者的报道必须尊重现实生活，尊重群众。

马克思在这一节以极具讽刺性的言辞描述了批判哲学家和批判记者们围绕《文学总汇报》而形成的荒唐精神王国，这种观点即使对于现代传媒理论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记者的报道到底是要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8页。

崇某一个理念，还是要尊崇事实，对理念的尊崇会不会使事实失真，理念和事实在记者的报道中到底各占怎样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媒体报道要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上而不能沉迷在贫瘠的理论当中，记者必须首先面对事实，面对群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不以罪恶世界为自己的家的批判的批判，必将在自己家里建立起罪恶世界”^[1]。

㊟ | 批判批判哲学对群众的蔑视和攻击

（一）批判哲学对部分好意相劝记者的攻击

在本小节，马克思以“‘不满’的群众的代表”来冠名两位对批判哲学心存疑问但又不能跳出批判哲学罗网的记者。其中一位记者在批判与布鲁诺一伙具有细微差别又同属青年黑格尔派的“柏林学社”时提出一个观点，即哲学应该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础。这位记者正确地指出：“我们最感需要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不是单凭思想的敏锐所能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必须使所有的感官都起作用，而且人的一切才能都必须当做必需的和最重要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否则，直观和认识是永远不够的……而且还会导致道德的丧失。”^[2]因此，批判哲学家们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的和工业的知识。另一位记者则直接认为《文学总汇报》辜负了他的期望。尽管这两位记者小心翼翼地竭力使他们中肯的建议不与布鲁诺的思想相违背，声称自己“为鲍威尔的言词找到了正确运用的方法”^[3]，但是这两位记者的观点仍然遭到布鲁诺的痛批。布鲁诺对待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9页。

度是傲慢的，他“对一切自然科学和工业只表示了一下尊敬，就算在指出它们的意义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了”^[1]。布鲁诺之所以对自然和工业如此傲慢，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界根本就不值得研究，自然“只不过是‘我们吃它们和喝它们’而已”^[2]，而那些极力主张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本身就是批判精神的敌人。鲍威尔之流甚至以“冥顽不化”这样的评价来对待来自基层记者的中肯建议和善意忠告，这两位记者也被他们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

对于布鲁诺一伙忽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错误，马克思提出了严正的驳斥：“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3] 马克思以两个连续的反问句，指出了批判哲学在考察社会领域问题上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认为脱离了对自然和工业的考察，根本无法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马克思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批判哲学的错误：“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4] 在这里，马克思把自然和工业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原则，认为脱离自然前提而对社会考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对于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主义缺乏完整生态自然观的陈词滥调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不仅重视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性意义，而且也对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倍加重视。第二，马克思指出了工业生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工业生产已经具备马克思在后来提出的生产力概念的因子。第三，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概念，比较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当中表达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是通过两个反问句来表达他尚未完全成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但是马克思的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反问句当中了。

（二）批判哲学对部分摇尾乞怜记者的抚慰

在本小节，恩格斯列举了另外一种记者，即那些“伤感的、诚恳的、求救的”并且摇尾乞怜、双膝跪地“乞求批判的批判说几句表同情的话”^[1]的记者，恩格斯描述了这些记者对批判哲学的基本态度及批判哲学家的自命不凡和自我吹嘘。

面对这些摇尾乞怜的记者，批判哲学家开始卖弄自命能够翻转世界的批判精神，他们自称拥有一支“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的轻装部队，这支轻装部队实际上就是这些自以为是的批判哲学家，他们自认为“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道德毅力和热忱”“是不可战胜的”。^[2]批判哲学家还指责傅立叶主义，认为法国人创立的傅立叶主义因为“理论还不够纯”^[3]而日暮途穷。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是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在纯粹的抽象理论中，而是在“实实在在的实践中”^[1]。恩格斯指出，批判哲学“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批判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来实现它的所谓伟大事业，实际上，这恰恰证明批判哲学“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2]

（三）分析批判哲学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

在本小节，马克思形象地描绘了那些不得不面对现实却无法挣脱批判哲学罗网的知识分子（记者）的矛盾状态。一方面，这些记者要保持对于批判哲学的忠诚，因此“群众和批判的紧张的关系只是以牧歌的形式表现在这位记者的身上”^[3]，另一方面，这些记者有时也会觉得批判哲学脱离了现实生活，他们也会意识到“布鲁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了解人类”^[4]。这种矛盾状态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这些记者“一脚踏上了批判的土地而另一脚依然还在尘世”^[5]，这导致他们诚惶诚恐地不敢越批判哲学的雷池一步，同时又不得不向现实看齐，这种相互矛盾的思维状态往往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成为“失去理解力”的可怜虫。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分子并参与他们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和布鲁诺一伙人交恶，马克思对这种交恶的解释在他给卢格的信中说得很明白——来自柏林的自由人（马克思将他们形容为“疯疯癫癫的庸人”）给他寄来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6页。

仅仅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翻转乾坤的废料”^[1]。恩格斯在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也坚决和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在理解了上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盲目自大的布鲁诺一伙“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的本质界定之后，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批判哲学产生如此大的反感。



分析批判哲学脱离现实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及原因

在第三节，马克思通过论述《文学总汇报》记者对于柏林学社的描述和批判的方式深入批判和辛辣讽刺了批判哲学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思维方式及其原因。

这些记者对于批判哲学家布鲁诺和埃德加尔等人的空泛言辞极尽吹捧夸张之能事，又将柏林学社的理论家贬斥得一文不值。他们一方面断言柏林学社具有“某种程度的疯狂，不受欢迎，毫无内容，毫无思想，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游移不定，空虚之感”，另一方面则满口称赞神圣家族“处理事情是一贯得心应手，运用范畴是独具匠心，研究问题是融会贯通，一言以蔽之，完全掌握了对象”。^[2]事实上，柏林学社的哲学家和批判哲学家并无本质不同，他们同属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阵营，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批判哲学完全自满自足地在批判精神当中进行思辨活动，完全无视精神之外的现实群众和社会生活，而柏林学社的哲学家则在坚持批判精神的本原立场之上认为批判精神对于现实群众的教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0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评价柏林学社的时候说他们是“既批判又非批判的群众”^[1]。

正是因为柏林学社的哲学家们所具有的这一点唯物主义倾向，遭到了批判哲学家及其记者们的歪曲、讽刺和鄙夷。《文学总汇报》的记者们罔顾批判哲学家看似振振有辞实则空洞无物的理论现状，罔顾批判哲学家的论著“既粗糙又夸张”的事实，反而指责柏林学社的哲学家们根本就不配理解批判哲学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批判哲学家对柏林学社的极端鄙视，他们认为批判哲学“要对付柏林学社之类的敌人，它无需‘任何其他武器，只用奥林帕斯的嘲笑就够了’”^[2]。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批判哲学家的傲慢和孤僻？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批判哲学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批判哲学之所以是傲慢的，是因为批判哲学把现实的对立换成了思想本身和世界、神圣精神和世俗群众之间的想象中的对立，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超越一切对立，这导致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批判哲学把以布鲁诺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家同除它以外的全人类对立起来，自以为自己凌驾于一切党派之上。批判哲学“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甚至当它似乎在研究某种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并未脱离无对象的孤独状态而同某种现实的对象发生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对象不过是它的想像的对象，是想像中的对象”^[3]。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思维上的不食人间烟火导致了批判哲学家在行为上“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4]。批判哲学之所以是孤僻的，是因为批判哲学家不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而是生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3页。

在思辨的思想当中。批判哲学认为只有精神是唯一真实的，认为在批判精神之外不存在任何真实内容，甚至“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是批判的批判本身‘制造’出来的”^[1]，因此，批判哲学的批判不是对那些处于批判的主体之外的现实对象的批判，批判哲学本身创造批判对象，批判哲学“是绝对的主客体”。既然批判哲学自始至终都在和自身打交道，它当然无法看到活生生的群众和现实的社会生活，这也就决定了批判哲学的孤独。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分析了批判哲学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原因。批判哲学一直都在批判精神的范畴内自说自话，批判的对象也是批判精神自我外化的结果，完全和现实社会不搭界，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批判哲学始终以一种悲天悯人和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待群众和社会生活。在批判哲学家看来，不理解思辨精神的群众很可笑，但是事实上，真正可笑的是不理解现实生活的批判哲学家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7页。

第十一章

揭露『批判的批判』的代理人鲁道夫的秘密

| 引子 |

批判哲学的代言人——鲁道夫

《神圣家族》第八章的题目是“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如果说《神圣家族》的第五章着重批判施里加以批判哲学的视角任意解读《巴黎的秘密》的话，那么在第八章，马克思则对施里加所推崇的小说主人公鲁道夫进行批判，同时揭露小说作者欧仁·苏道德教化论和阶级调和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施里加把鲁道夫当成了批判哲学的代言人，在施里加看来，鲁道夫作为“人类国家的头等公仆”乔装微行周游世界拯救人类的举动，恰恰体现了批判哲学的真谛。鲁道夫真正领会了批判哲学的纯批判思想，“这个思想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经验，比鲁道夫即使在良师指导下所能从这一历史中汲取的一切知识，都更有益处”^[1]，并且也只有像鲁道夫这样敢于无情批判的人的出面，才能使世界免于灭亡，才能实现批判哲学的伟大理想。

那么，这个被施里加冠以“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荣誉的鲁道夫究竟是何许面目呢？马克思在本章集中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7页。

一 | 刺客转变成“狗”的秘密

在《巴黎的秘密》这本小说中，“刺客”原本是个屠夫，是一个自然的、强悍的凡夫俗子（自然之子），原本有着“善良的性格”。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经历，这位屠夫变成了杀人犯混迹于社会底层。刺客有一次凌辱玛丽花，碰巧被鲁道夫撞见，鲁道夫以武力征服了刺客，并博得了刺客对他的尊敬。于是，鲁道夫就开始以批判哲学为工具对刺客进行改造，他以“你还是有心肝和骨气的”这句话激起了刺客的自尊心，并最终使刺客改邪归正转变为一个“有道德的生物”，即资产阶级礼教的看门狗。^[1]

马克思通过分析鲁道夫对刺客的改造过程，揭露了作家欧仁·苏所宣传的道德感化论的实质和危害。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鲁道夫把刺客由“屠夫”改造为“狗”的过程可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鲁道夫教会刺客“伪善、背信、狡黠和伪装”，并“靠着批判的批判的‘纯粹’诡辩”轻松说服了这个自然之子，使他相信“下流的勾当如果出于‘善良的、道德的’动机，就不算是下流的勾当”，把刺客变成了密探和奸细。^[2]于是刺客也就装着友好和守信的样子，把旧时的同伴诱入了致命的陷阱，做了他人生中第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刺客开始有了道德意识。

第二阶段，鲁道夫把冷酷无情的刺客驯服成“彬彬有礼的有道德的生物”。刺客对鲁道夫像看家狗对主人一样顺从，他作为自然之子的独立性和个性完全消失了，他已不在自己的人类个性中寻求自己的行为动机，而是按照狗的“忠顺”德行行事。刺客已被鲁道夫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8页—第209页。

改造成了“一头非比寻常的、有道德的看家狗”^[1]。刺客开始变得有道德了。

第三阶段，鲁道夫开始教授刺客“小市民式的礼仪”，代替了他那“虽粗犷却勇敢的率直”；为了让刺客同“有道德的生物”这种身份相适应，鲁道夫又让他学会了“庸人的举止和风度”。更可悲的是，鲁道夫以批判的批判思想为依据，赋予了刺客以新的生活内容。他把刺客派到非洲，希望给不信神的世界提供一个成功教化的例证，然而这个所谓“悔过的生动而有益的例证”实际上不过是成功塑造了一个剥掉固有人性的基督徒而已。刺客的道德演变为基督教的教义。^[2]

第四阶段，鲁道夫将刺客教育成一个温顺而谨小慎微的人，使他的所作所为都被“恐惧和世故”所节制。刺客开始变得世故，生怕连累自己，学会了对某些事闭口不谈。批判的批判使刺客昔日的淳朴和率真烟消云散，刺客的道德也变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世故。

第五阶段，刺客开始学会自觉地“以文明的方式领会他对鲁道夫的那种狗式的忠顺”，他是如此表达他和他的主子鲁道夫的关系的，“他之于我就如上帝之于神甫，我真愿意对他俯首跪拜”。^[3]在鲁道夫的教化下，刺客变得几乎失去自我。

第六阶段，刺客最终为鲁道夫而送命，“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他那忠矢不二的有道德的看家狗式的一生”。^[4]刺客以“狗式的自白”结束了他被教化的生涯，成了批判哲学道德改造的牺牲品。临死时刺客还不忘对主子表示感激：“您对我说过我是有心肝和骨气的。”^[5]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1页。

克思指出，批判的哲学对人的改造就是葬送人的性命，而施里加却对此大加赞赏。

通过描述鲁道夫对“刺客”的道德教化过程，马克思向人们表明，这种道德教化其实并不是教人向善，并不是对人的解放，相反，它是通过资产阶级道德达到对人禁锢的最终目的。“刺客”在鲁道夫的教化过程中其实并没有觉醒，相反，他被鲁道夫的这种愚民教育所俘虏，这种道德教化使“刺客”从一个原本有着反抗精神的社会下层人士转变成为旧制度、旧道德辩护和殉葬的卫道士。他的死亡证明，“刺客”的身心已全部被这种道德教化，被这种批判精神所毁灭。批判哲学的虚伪性、有害性和反动性昭然若揭。

通过这一节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马克思不仅认为鲁道夫对刺客的改造是完全失败的欺骗之举，更是坚决反对单纯通过道德革命来达到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的目的。批判哲学的信奉者施里加之所以高度评价欧仁·苏及其小说《巴黎的秘密》，完全是出于他对书中所提倡的道德感化论的认同。施里加和欧仁·苏同样是道德革命论的热情拥护者和鼓吹者。马克思通过对刺客的转变过程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道德改造理论的苍白无力，它不仅注定不可能成功，而且是有害和反动的，其理论归属还在于维护旧制度和旧道德。

● | 玛丽花皈依宗教的秘密

在《神圣家族》第八章第二小节，马克思着重对《巴黎的秘密》中玛丽花这个人物进行了分析，揭露了鲁道夫对玛丽花改造的实质。在进行揭露以前，马克思首先对施里加的论述逻辑予以批判。

马克思分析到，在施里加看来，世界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神类”的绝对主动的因素，《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

公鲁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各种威力和自由”，是世界唯一的能动原则。另一部分是消极的“世界秩序”和属于它的人，这种世界秩序构成“现实事物的基础”。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施里加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造成“僵死的群众”和批判哲学（以鲁道夫为代表）之间的二元论。而施里加为了避免他的划分必然导致出现“僵死的群众”这一结果，他“不得不又承认世界秩序和群众也有几分神类的属性”，他还要追求在他的思维逻辑之下“人类的事物不致被描写成绝对不自由的和没有能动性的”。^[1]正是出于这种矛盾，施里加赋予玛丽花一个特别的角色，使她“执行着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使命”^[2]，以便使玛丽花这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物身上反映出“鲁道夫和世界这两者的思辨的统一”^[3]，也就是说，施里加希望在玛丽花身上寻找对其二元论的调和。

马克思尖锐批判了施里加这种思维方式，指出“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设计跟鲍威尔对圣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施里加“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黑格尔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4]正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5]一样，施里加无非是要将玛丽花这个现实的人解读为批判哲学“观念的体现”。施里加完全“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来评论欧仁·苏的小说，而现实的“史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页。

诗的观念同施里加先生的逻辑连贯性是互相矛盾的”。^[1]施里加的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完全一致。

通过对施里加论述逻辑的分析和揭露，马克思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小说的每个重要人物和场景，都被施里加赋予了思辨哲学的意义，因此，施里加不是在评论小说，而是在利用小说贩卖他的思辨哲学逻辑。施里加的思辨哲学逻辑实质上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蹩脚翻版，无非都是一种“儿子生出母亲”的颠倒因果的哲学体系，这种故弄玄虚的哲学体系其实早已经没有新意。

在揭露了施里加荒唐的思辨逻辑之后，马克思开始分析玛丽花被改造的过程。通过把玛丽花本来的形象和批判的变态形象做对比，马克思揭示了这个人物由本真到变态的悲剧一生。

玛丽花是一个卖淫妇，生存在“罪犯麋集的酒吧间”，“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质感动了她周遭的人，使她在罪犯的圈子里成为一朵“含有诗意的花”。玛丽花“虽然十分纤弱”，但是她“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她首次出场就“拿起剪刀来抵抗用拳头打她的‘刺客’”，这表明她不是一个屈服于暴力之下待宰的羔羊，而是一个善于捍卫自己权利和能够坚持斗争的女郎。^[2]而且，这女子生性豁达，她“出狱以后没有去找工作，而把在狱中赚得的300法郎统统花在游逛和装饰上”，她能够以轻松的笑来回敬别人对她的挖苦，并且能够乐观豪迈地宣称“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3]更重要的是，在如何看待自己的悲惨人生这个问题上，玛丽花并没有求助于宗教忏悔，她“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5页—第216页。

她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命运”，并且，她坚持认为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1]此时的玛丽花，年轻，善良，纯洁无瑕，充满着希望和朝气，她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可以“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2]玛丽花有着纯洁无瑕的天性，有着来自自然的、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善良，完全没有被资产阶级的精神锁链所钳制。

然而，在遇到鲁道夫以后玛丽花的不幸就开始了。本真的玛丽花开始消失，批判的玛丽花开始显现，直到她悲惨地死去。

当玛丽花和鲁道夫第一次散步时，鲁道夫就迫不及待地想和她来一场“道德谈话”，并着手为玛丽花“建造空中楼阁”。^[3]鲁道夫把玛丽花带到了虔信者若尔日夫人的农场，又“唤来了一个可怜的、迷信极深的教士拉波特”^[4]对她进行批判的改造。在若尔日夫人和教士拉波特的基督教道德教化之下，玛丽花身上散发的那种自然人性之美——天真、烂漫、率真、自尊、热爱大自然和生活的品德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认为有罪的自卑，误以为荣誉的忏悔。若尔日夫人和教士拉波特利用这种宗教道德把玛丽花一时的迷误视为终生的罪孽，剥夺了她嫁人和谋求自我幸福的基本人权。“教士已经成功地把玛丽对于大自然美的纯真的喜爱变成了宗教崇拜。”^[5]“她已经为宗教的伪善所支配，这种伪善把我对别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0页。

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1] 玛丽花开始学会把一切奉献给上帝，学会心口不一的灵魂分裂和道德自虐。

对于玛丽花而言，“折磨自己就成了美德，而忏悔则成了荣誉”，她变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2] 玛丽花的人性之美已经被这种宗教道德腐蚀成迷信之雾。玛丽花的命运归宿是悲惨的，她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之下，最终悲惨地死在了修道院。

玛丽花的悲剧性命运说明，正是鲁道夫这样的道德教化“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3]。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以“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在想象中给了玛丽花以慰藉。^[4] 它表明批判哲学家施里加和小说作者欧仁·苏所宣扬的道德教化是多么违反和扼杀人性。

在批判哲学家施里加看来，不管是刺客还是玛丽花，都是批判哲学道德教化的成功例子，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教化恰恰是悲惨命运的源头。对于玛丽花这种人的解放，并不在于变革她们的思维，更不是让她们心系上帝安贫乐道，而是要改变社会，改变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极力反对离开社会经济基础的所谓思想变革，而强调只有到市民社会现实中才能找到改变人类社会非人性状况的根本动力。批判哲学借尸还魂，高调宣扬欧仁·苏的道德革命论和道德教化论，实际上是倒果为因，不仅苍白无力，而且违背和扼杀人性。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玛丽花皈依宗教的真正秘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4页。

③ | 法纪理论和道德教化的秘密

（一）改造“校长”所展现出的刑法理论的秘密

在小说《巴黎的秘密》中，“校长”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这个罪犯有着古希腊神话人物海格立斯大力士的体型，精力充沛、性如烈火、放荡不羁、荒淫无度，这种性格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所崇尚的平庸无能、温文娇弱和暗中交易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是相冲突的。鲁道夫之所以要批判地改造“校长”，是因为他“想用他给法律界创造一个范例”，而使自己有资格成为“最伟大的德国刑法学家”。^[1]那么，鲁道夫对“校长”的改造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刑法理论呢？

1. 鲁道夫的刑法理论

在鲁道夫看来，人的肉体 and 灵魂界限分明，人的肉体无足轻重，只有灵魂才是神圣的，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如同施里加把人的灵魂看作属于天国一样，“校长”的肉体和力气应该鄙弃，所以“不应把这种力气当做本质上是人类的东西来处理”，而要消灭这种力气。^[2]因此，鲁道夫“所关心的不是拯救实际的‘校长’这个人，而是从精神上拯救他的灵魂”^[3]。所以，他首先弄瞎了“校长”的眼睛。

马克思认为，鲁道夫的拯救手段实质上是基督教的翻版：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施里加之所以赞赏鲁道夫，是因为鲁道夫的拯救方法同批判哲学的法学主张不谋而合。批判哲学视鲁道夫为“纯批判的伟人”，说明批判哲学关于刑法的思维方式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和鲁道夫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要使他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强制他沉没于自己抽象的内心世界。施里加的观点也与基督教的教义不谋而合，即“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须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马克思据此指出：“这种把法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刑罚理论，这种‘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天主教教会的刑罚理论而已。”^[1]

除了弄瞎“校长”的眼睛，鲁道夫对“校长”的改造也与改造玛丽花如出一辙。如同鲁道夫最终把玛丽花关在修道院一样，他也把“校长”禁锢在观念的修道院里。“这是不为外界的光亮所扰的漆黑如夜的修道院，是寂静无为的良心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的修道院，在这种修道院中栖身的只是一些虚幻的回忆的影子。”^[2]

马克思指出，尽管施里加没有公开宣布鲁道夫的刑法理论与基督教的赎罪理论相一致，但是在理论阐述上施里加对二者是一视同仁的。施里加不过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刑法理论，黑格尔认为刑罚是罪犯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而施里加则认为“惩罚应当使罪犯成为制裁他‘本身’罪行的‘法官’”^[3]。无论是黑格尔的刑法理论还是施里加的刑法理论都只不过是基督教刑法理论的思辨表达而已。

2. 改造“校长”的实际效果

鲁道夫通过先挖掉“校长”的眼睛，而后把他禁锢在观念的修道院中使之皈依上帝的做法是不是真正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呢？他改造“校长”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在施里加看来，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以后，鲁道夫立即就完成了——一个道德的奇迹。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被挖掉眼睛的“校长”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页。

并没有真心皈依上帝，充斥在他心中的是满满的报复的邪念，他成了一个假道学家。鲁道夫本来想要“校长”相信肉体暴力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当他用暴力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也就向“校长”证明了肉体暴力的强大。

在鲁道夫的教化之下，“校长”也学会了通过摧残他人肉体的方式满足自己道学家的虚荣。“他不仅在表面上模仿主人公鲁道夫的样子，挖出了‘猫头鹰’的双眼，而且也在精神上学习鲁道夫的榜样，重复他那伪善的言辞，用假仁假义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残暴行为。”^[1]“校长”通过极其残忍的手段弄死“猫头鹰”的时候，并不妨碍他给杀人的行为附上道德的动机，他想通过犯下新的杀人罪来实现对自己以往杀人罪的忏悔，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有道德的杀人犯，这就是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马克思明确指出：“‘校长’对‘猫头鹰’发出来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嚎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这种种表现给我们揭穿了‘校长’在牢房中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的性质。”^[2]因此，“校长”自己也道出了鲁道夫道德教化的秘密，“他夺去了我的视力，但是没有使我丢掉作恶的念头”^[3]。

3. 马克思对道德教化论的批判

马克思揭示了鲁道夫道德教化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如果把感性世界转化成“赤裸裸的观念”，那么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小说主人公鲁道夫、小说家欧仁·苏，还有批判哲学家施里加，他们所提出的“单人牢房制”等具体改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第231页。

手段都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道德教化手段，这种道德教化的秘密实际上就是“纯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这种秘密也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连串的梦想”^[1]。马克思认为，这种道德教化的结果就是，“就跟鲁道夫毁了玛丽花和‘刺客’一样，他也毁了‘校长’：他让玛丽花去受教士的折磨，受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折磨；他剥夺了‘刺客’的人的独立性并把他贬低到看家狗的卑下地位；他为了使‘校长’学会‘祈祷’，便挖了他的双眼；他就这样把三个人都毁了”^[2]。所以，马克思总结说：“受了‘纯批判’的‘简单’改造以后的各种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种种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3]

马克思对道德教化论的批判，使我们进一步知晓，鲁道夫的所谓道德教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否定现实生活、否定人的肉体使人回归心灵，使人通过道德反省的方式自我教化，这种教化手段也是基督教惯常使用的手段，最终结果不仅不能使人获得提升和解放，反而会使变成戴着道德面具作恶的“伪道学家”。从小说中鲁道夫对几个人物的“改造”效果来看，道德教化不但没有起到教人从善的效果，反而从身心两个方面摧毁了他的教化对象，他要么是使独立者“刺客”变得愚昧顺从，要么是使善者“玛丽花”郁郁而死，要么是使恶者“校长”穷凶极恶。因此，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目的就在于表明，批判哲学家施里加所崇尚的道德教化论实际上是思辨唯心主义在道德领域内的体现，而其实际效果则是在给基督教张目。它不仅无助于对现实的改造，而且极为有害。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9页—第23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0页。

(二) “赏善罚恶”的双重裁判的秘密

作家欧仁·苏借用鲁道夫这个角色推出了一种用赏善罚恶的“双重裁判”手法来改造社会的“新理论”。在这个所谓的新理论中，欧仁·苏不仅要求惩罚人世中的恶行，也要求奖励人世中的善行。欧仁·苏依照他所完全支持的现行刑事裁判的每一个条款，依样画葫芦地描绘了他的“双重裁判”理论。比如说，现行的裁判体系要求“手中持剑，旨在斩断恶人之头”，欧仁·苏则要求在惩罚恶人的同时奖赏善人，即“手中持冠，旨在给善人加冕”。^[1]他甚至可笑地要求在处决罪犯的断头台正对面建立一座善人高踞其上的所谓善行台，从而使人民知道为恶受罚的可畏和为善受奖的荣耀。

那么欧仁·苏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新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马克思指出，被欧仁·苏看作是社会善治秘密的“双重裁判”实际上是对边沁理论的重复，只不过当边沁“还完全停留在罪恶的尘世中的时候，欧仁·苏先生的演绎却超升到了批判的天国”，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2]而且，被马克思称为“群众的共产主义者”的欧文早就指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的完整表现”^[3]，欧仁·苏提出的只不过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乌托邦而已。

马克思指出，当欧仁·苏自鸣得意地提出惩恶扬善的乌托邦理论的时候，完全忘记了惩恶扬善的社会戏剧早已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上演。在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巴黎，每年都在颁发的“德行奖”，“这些奖赏甚至是以双重的形式设置的，有奖励男人和女人的高尚行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0页。

为的物质奖赏，……也有奖励品德完美的处女的 Prix rosière [罗节奖]。这里甚至也并不缺乏欧仁·苏所要求的蔷薇花冠”^[1]。此外，《辩论日报》、《世纪报》、《巴黎小广告》等报纸每天也都在不惜重金地记录和宣扬巴黎的各种证券投机商人的德行、伟绩和功德，更不用说每个政党都各有自己的机关报来记录和宣扬本党成员的政治上的业绩了。

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对欧仁·苏的道德教化论的讽刺和批评暗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道德所具有的阶级性。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明确讲出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但是马克思通过讽刺和批判的手法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欧仁·苏根本就不清楚道德的阶级性，幻想着通过抽象的道德奖励和树立道德模范的方式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这在马克思看来根本行不通。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欧仁·苏所提倡的惩恶扬善的手段并不是没有被采用，它实际上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只不过这种惩恶扬善只是在阶级范畴内使用，惩的是阶级范畴内的恶，扬的是阶级范畴内的善，抽象的惩恶扬善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关于消除野蛮和无法纪的秘密

文明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野蛮现象，法治国家同样也存在无法纪的情形，那么如何消除文明中的野蛮现象和国家中的无法纪情形呢？欧仁·苏认为，首先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应该再拥有犯罪而不受惩罚的世袭特权，其次是要任命一批领取固定薪俸的律师为穷人办事。在欧仁·苏看来，似乎只要对法国的国家法律就上述两点作出改变，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

可以消除法国的犯罪行为及文明中的野蛮和“无法纪状态”。

对于欧仁·苏的观点主张，马克思指出，“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1]。针对欧仁·苏不能认清法制和现存社会秩序之间的主次关系，马克思讽刺道：“法纪和事实的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区别，对于批判的小说家也许还是‘巴黎的秘密’呢！”^[2]欧仁·苏认为天下大治的秘密就在于变革法律，而实际上这只是舍本逐末。尽管欧仁·苏的观点荒谬可笑，但是这并不妨碍欧仁·苏自己声称他正在进行“伟大改革”，而他所进行的伟大改革只不过是在小说中“说了就等于做了”而已。

纵观此小结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再次对法律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与欧仁·苏提出的法律关系的改变就可以使社会关系发生改变的荒谬观点相反，马克思提出了“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包含的思想非常可贵，它既是对马克思早期所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的延伸，实际上也蕴含着马克思后来成熟著作当中所提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辩证关系的思想雏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水平，马克思批判了欧仁·苏等人在法和市民社会当中的本末倒置的观点，这也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的唯物史观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初的诞生地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 | “观点”的秘密

在批判哲学看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以抽象成“观点”。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3页。

克思指出，尊崇“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是批判哲学的主要秘密之一。施里加自己道出了批判哲学的这一秘密，他说：鲁道夫思维的秘密就是“不遗余力地用自由选择的方式上下左右地来领会各种观点”^[1]。对此，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指出，批判哲学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施里加如此，批判哲学的“族长”布鲁诺·鲍威尔也是如此。马克思由此追根溯源，指明了批判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认为，批判哲学的理论勇气来自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芜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黑格尔把世界理解为“纯粹的范畴”和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能够在纯思维领域当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于是，批判哲学家进一步发挥道，既然批判哲学已经把感性现实的世界理解为纯粹自我意识，因此在纯思辨领域，批判哲学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征服，现实社会的改变自然仅仅只是思维领域之内的事情。批判哲学的“观点”认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这个世界征服了。”^[2]

马克思继续指出：“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3]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仅仅是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3页—第24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但是对于现实生活丝毫不起作用。“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因为它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存在”^[1]。批判哲学的鲍威尔一伙则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所换的名字则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简单的术语——观点”^[2]。也就是说，批判哲学家对于黑格尔的哲学仅仅是用“观点”这个概念替换了“自我意识”这个概念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批判哲学思维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3]。

马克思同时指出，批判哲学尽管继承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衣钵，但是并没有继承黑格尔哲学中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因素。在黑格尔的“现象学”当中，不仅包含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4]，而且“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5]，这一切却被批判哲学家置之不理，所以马克思说批判哲学家把黑格尔哲学发展成了一种“最保守的哲学”。

马克思分析了批判哲学的思维方式和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异同。就其相同方面而言，批判哲学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对待黑格尔哲学。这种思辨唯心主义的根本特征，致使鲍威尔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用观点对观点的批判来否定观点。就其不同方面而言，批判哲学完全否定了黑格尔哲学当中唯物主义的辩证内容，使得批判哲学失去了干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现实生活的手段。马克思说道：“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像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1] 正是因为思辨唯心主义的本质特征，思辨哲学和思辨哲学家最终沦落为“最保守的哲学”和极端保守的“职业神学家”。

马克思指出，在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框架下，批判哲学家根本看不到意识和存在的区别，他们“想不到，竟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思维内部的区别，他们仅仅是想通过“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像存在”的方式来扬弃现实的存在，而实际上“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这些状况是批判哲学家想不到的。因此，关于存在和思维的同—，在批判哲学那里只能像在黑格尔哲学那里一样，以“神秘同—”的形式存在着。^[2]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马克思的论述似乎也昭示出，存在一种不同于思辨哲学和批判哲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与批判哲学不一样的回答。马克思说，这种理论是“有所区别于理论的实践”，而且和“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把某一特定范畴消融于‘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这种做法的理论”显然具有本质不同。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全新面貌，所以面对这种全新理论，“批判便油然而生出一股怒气”。^[1]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有所区别于理论的实践”，马克思通过对批判哲学思维与存在“同一”主张的驳斥，提出了“实践”这个概念。此时的“实践”概念已经和《德法年鉴》时期在犹太人卑污的活动意义上所谈的实践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已经是在消弭思维和存在二元对立意义上提出的实践，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在这一节还提出了两个在后来影响深远的见解，第一个见解是首次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问题，给后来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观点的恩格斯以很大的启发。第二个见解是马克思在消融思维与存在二元论的意义上提出了实践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预示着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概念的产生，也预示着作为新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渐渐浮出水面。但是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可能被低估了，或者说被其他著作的更加明确详细的论述所掩盖了。

五 | 慈善的秘密

在“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或克雷门斯·达尔维尔”这一小节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鲁道夫有关道德解放的伪善面目，具体表现在鲁道夫庸俗地运用傅立叶的学说，把慈善作为消遣，用恋情来渔利。

年轻的侯爵夫人克雷门斯·达尔维尔热心的其实不是慈善事业本身，而是某种消遣，她之所以从事慈善事业仅仅因为“慈善事业只是一种外在的理由，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2]。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7页。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之所以看起来热心慈善，仅仅是因为从这些慈善活动当中，他们能享受到“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1]。鲁道夫之所以能够获得侯爵夫人的欢心，只是因为他在对待慈善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侯爵夫人是完全一致的。鲁道夫无意中说出了资产阶级社会当中早已公开的秘密，这就是：“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2]因为这种特殊的消遣，侯爵夫人也就因此爱上了鲁道夫，而鲁道夫也打算跟她一块乔装变服，跟她私通，跟她一起搞种种慈善性的猎奇活动，即一起消遣。所以，鲁道夫的道德教化对于侯爵夫人而言，“至多只能教会一个不幸的女人跟不幸的人们演笨拙的笑剧而已”。^[3]

通过对鲁道夫与侯爵夫人的“消遣”式的慈善事业的分析，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与刻画。也就是这种慈善事业仅仅是资本主义达官贵人“供消遣用的材料”而已，或者说，资产阶级其实并不关心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真正的慈善，而仅仅是以慈善为借口找到消遣的材料，这种消遣不仅要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且要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统治阶级往往通过举办这类慈善活动来满足自私空虚者的猎奇心。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8页。

六 | 妇女解放的秘密

在“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这一小节中，马克思批判了鲁道夫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错误观点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正面论述。

鲁道夫在路易莎·莫莱尔被捕时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如果主人虐待女仆，迫使她去犯罪，比如说奸污女仆致其怀孕，那么少女杀害婴儿的犯罪不应受到惩罚。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鲁道夫的这种议论能够被扩展为对主奴关系本身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鲁道夫并不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所遭受的普遍的非人性待遇。鲁道夫认为要实现妇女解放，仅仅是“缺少一条惩办诱奸者并把忏悔和赎罪跟严厉的惩治结合起来的法律”^[1]。但是实际上，仅有法律规定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如英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立法，但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

实际上，鲁道夫不但不是妇女解放主义者，他关于妇女解放的见解甚至远远达不到他所模仿的傅立叶的认识层次，鲁道夫充其量是资本主义社会把妇女物化的赞同者。在这个意义上，把“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的评述以及法国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派别的著作拿来同鲁道夫的论断对比，完全是多余的”^[2]。可见，鲁道夫绝对不是一个妇女解放主义者，他“虽然是个小统治者，但却是这种关系的大卫道者”^[3]。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8页。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妇女解放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妇女解放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是基本赞同傅立叶的观点而反对鲁道夫的观点的。马克思通过直接引用傅立叶原文字句的方式表达了对傅立叶的支持。对于资产阶级的婚姻，傅立叶说：“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1] 在评价妇女遭受奴役的原因时，傅立叶说，“对于使妇女陷于奴隶状态这件事，男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应该受到惩罚”^[2]。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傅立叶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3] 由此可见，在妇女解放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妇女解放不应该首先在法制的完善上下功夫，妇女遭受奴役，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年轻的姑娘对于任何一个想把她变为自己独占财产的买主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商品吗”^[4]，因此需要改变的是导致妇女遭受压迫的“文明的机械论”。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与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于妇女解放的阐述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主张通过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方式来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当然，马克思此时的认知深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有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马克思还没有深入细致地去分析整体社会结构对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页—第25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9页。

七 | 政治经济学的秘密

在这个部分，马克思通过对鲁道夫所提供的几个范例的分析，揭露了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无知。正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毫无所知，他们才提出了一些荒唐可笑观念和设想。比如说，他们认为破产之所以会发生，原因是“富有常常使人挥霍无度”，所以通过对富家子弟进行节俭教育就可以杜绝这个社会弊病。他们认为“大宗财产就是托付给英明、坚定、敏捷而宽厚的人的继承钱财、封建采邑”，因此富家子弟在道德上是有责任的，而“国家应该使富有道德化”。^[1]他们力求实现资本和劳动的联合，这种联合“既保证工人的福利，又不损害富人的财产，它用互相倾慕、互相感激的纽带把这两个阶级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保证国家的安宁”。^[2]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一种社会乌托邦的幼稚假设。任何一个对于现实经济关系有深入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提出这种软弱无力的道德教化论。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了解市民社会的一把钥匙，要深入了解市民社会，就必须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于那种空想的社会改造理论十分厌恶，对于希望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调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态度十分反感，在马克思看来，在政治经济学已经比较发达的时代，仍然宣扬道德教化和阶级调和的人，只能是重复落后于时代的陈词滥调而已。

为了进一步揭露批判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一无所知，马克思详细分析了鲁道夫所提出的“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两个范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1页。

在小说中，主人公鲁道夫将创立贫民银行作为其社会改造的重要措施。贫民银行的章程规定银行的主旨是“代替施舍和当铺”对“规矩的有家室的工人”在失业期间予以救济。银行为每位失业的工人发放 20 到 40 法郎的无息救济贷款，贷款在工人重新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始归还。但是工人要想得到这笔贷款，必须持有自己“行为规矩”的证明，此外还需要有人担保。^[1]鲁道夫所设想的这个银行每年有 12000 法郎的收入，但是主管人员年薪则达到 10000 法郎，剩下的钱仅仅够救济 400 个工人，还不到应救济工人的十分之一。而且银行发放的救济基金“只够买不及他本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的面包”。^[2]

马克思指出，鲁道夫的贫民银行实际上是建立在幻想之上，因为他居然幼稚地认为“只要改变一下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3]。批判哲学家根本就没有分析工人为什么会失业，也没有分析银行的运作规律，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的贫民银行必然破产。批判哲学家之所以对鲁道夫的社会改革方案顶礼膜拜，还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根本就没有登堂入室，仍然是在道德救赎论的范畴内异想天开，这种社会改革方案必然是要失败的。

马克思在嘲笑批判哲学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无知的同时，也在同时强调，对于研究社会而言，绝对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有脱离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才具有了科学主义的实践手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1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2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2 页。

小说主人公鲁道夫还在布克伐尔建立了一所模范农场。农场的工人待遇丰厚，农场还为工人提供免费的膳食和住宿。马克思经过分析认为，如果鲁道夫的创新试验得以成功，“那末不仅在国民财富的分配方面，而且在国民财富的生产方面，都要引起一场革命”。原因在于，农场生产得到扩充只是因为工人劳动量翻了一倍。而且如果鲁道夫的设想得以实施，也就是新农场的工人的膳食得到改善，“这种批判的改革最后就会完全消灭法国的畜牧业”，因为整个法国也不可能提供如此多的肉类。^[1]鲁道夫除了给工人高额的工资和丰盛的膳食以外，还把农场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给了工人，而这笔钱正是他的地租。但是实际上，鲁道夫在牺牲了自己的地租的同时，并没有牺牲自己投入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因此，连农场的管家沙特林老爹也得出结论，“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殿下增加了自己的收入”。^[2]

马克思通过这种分析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试验“不过是幻想的空中楼阁而已”，它的理想的劳动分工和产品分配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二是鲁道夫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试验同时也是虚伪的，鲁道夫并不单单是为了改革社会，他也是要通过这个改革来发财致富。但是，鲁道夫很明显的空想却蒙骗了批判哲学家，批判哲学信誓旦旦地声称“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不是乌托邦”。^[3]这再次证明，批判哲学家对政治经济学是多么的无知。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批判哲学之所以醉心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造空想，却不愿意为整个社会的改造动一根手指头，他们的这种态度本质上取决于他们的思辨唯心主义实质。当他们确实没有办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5页。

法去改造世界的时候，醉心于这种批判的空想当中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就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也许针对的就是以批判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旧哲学。

八 | 作为批判哲学代言人的鲁道夫的秘密

在“鲁道夫，‘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这一节，马克思通过分析和揭露鲁道夫的个性特征，进一步证明了鲁道夫以及批判哲学在道德上和在社会改革措施上的软弱无力及言行的虚伪性。

鲁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那么这个“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善人呢？马克思逐一进行了分析。

第一，鲁道夫的行善的资本来自他“像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否则，“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2]也就是说，鲁道夫作为残暴压迫者的身份并不妨碍他自认为是“善人”，他也“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并且不妨碍他认为自己肩负“惩恶扬善”的伟大使命，认为“自己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3]

第二，鲁道夫的善行并不是为了完善他人，他的善行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喜爱风流韵事的好奇心以及满足他“火热的激情”而已。“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些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比如，他之所以解救黑人医生大卫及其情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0页。

妇，不是出于这些人的命运所引起的人类同情心，而是为了要惩罚奴隶主维里斯不信上帝。他之所以要惩罚“校长”，也只是证明他的刑罚理论，实现他的功名心。他之所以关心玛丽花，仅仅是因为他对于女儿爱恋的移情。他之所以同情达尔维尔侯爵夫人，仅仅是因为老达尔维尔侯爵对于鲁道夫的父亲有恩。他之所以对若尔日夫人仁慈以及关心她儿子热尔门，仅仅是因为若尔日夫人属于达尔维尔家族。可见，在鲁道夫所标榜的道德的救赎的正义之举背后，隐藏着“高尚行为的纯个人动机”。^[1]

第三，鲁道夫的性格完全表现为“纯粹的”伪善，他巧妙地用道德的手段“把自己的邪恶的情欲的发泄描述为对恶人的情欲的愤怒”^[2]。鲁道夫劝诱“校长”到他的住所去偷盗，他所考虑的远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是想得到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3]当医生因害人的恐怖而战栗的时候，他便马上用他的道德理论来掩饰个人的复仇心，“巧妙地大谈其‘纯’理论的动机来掩饰个人的复仇心”，油腔滑调地认为“他将来还是有悔改的无限境界的”。鲁道夫的伪善和宗教裁判所在烧死异教徒的时候总要祈求上帝赐予罪人以仁慈并无区别。鲁道夫在作恶的同时，也总是以道德的化身来掩饰自己的无耻，总是“俨然以世界法官自居”。^[4]鲁道夫总是向他人宣称他把对恶人的这种憎恨“看做他在行善方面的一个进步”，但是实际上，他的“道德憎恨的这种加深无非是一种伪善的口实”而已。^[5]“作为一个纯粹的批判家，他不同自己身上的这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4页。

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1]

第四，鲁道夫在刑法的运用方面也是伪善的。尽管他以刑法方面的专家自称，但是当这种刑法理论和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家族发生矛盾之后，他又取消了他的理论。如他想废除死刑，想把惩罚变为忏悔，但这只是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鲁道夫的亲属的时候才是如此。只要鲁道夫的亲属中有一个人遭到杀害，他马上便会采用死刑；他需要双重的立法：一种适用于他这个伟人，另一种适用于凡人。因此，当他知道雅克·弗兰对玛丽花之死负有罪责的时候，这种仇恨又重新点燃了他那狂热的复仇心和他那嗜血的欲望。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道：“好一个‘善良的’鲁道夫呵！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只是因为幸运、金钱和官衔，这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2]

在马克思看来，鲁道夫这种伪善手法和批判哲学如出一辙，“批判的批判也是把自身的愚蠢硬说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对世界在它之外的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硬说成是这个世界对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最后，把自己的利己主义（它以为自己汲取了、吸收了全部精神）硬说成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3]。也正是因为批判哲学和鲁道夫的这种一致性，所以尽管鲁道夫有如此彻底的虚伪性，而批判哲学则对此完全无视，批判哲学家施里加还在那里为鲁道夫唱赞歌，还在声称鲁道夫是“善良的房客”“善良的邻居”“善良的朋友”“善良的父亲”“善良的资产者”“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页。

主”，是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的大英雄。^[1]

在本章最后一小节，马克思通过分析鲁道夫的立身行事的虚伪性直接指责批判哲学家们立身处世的虚伪性。正如鲁道夫打着道德的旗号并不妨碍他干伤天害理的勾当一样，批判哲学家们打着道德革命的旗号也并不妨碍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深层次认同。因此，正如鲁道夫是打着道德旗号的卫道士一样，批判哲学所发挥的作用也绝对不是革命的，而只是表面上革命实际上仍然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衷心拥护者。这就是“批判哲学”的代言人鲁道夫的真正秘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5页—第266页。

第十二章

末日的审判

在《神圣家族》一书第九章即最后一章，已经完成批判任务的马克思此时似乎如释重负，写作风格也显得轻松与幽默，他以诗化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一幕批判哲学审判世界的戏剧性场景。

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场景中，批判哲学家们幻想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已经两次通过鲁道夫之手拯救世界免于灭亡，现在又要借批判哲学家希采尔之口宣告对整个世界的末日审判。自以为正义在身、真理在手的希采尔“右脚踏群众，左脚踏沙洛顿堡；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批判哲学家们就像牧羊人对待羊群一样对待群众，就像基督和先知一样清算尘世的“罪恶”，目的就在于通过批判哲学的批判“亲自宣布世界的灭亡”。^[1]

马克思指出，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只不过是在思维领域逞英雄，是一些“冒牌基督和冒牌先知”，在这些冒牌的基督和先知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莫过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鲍威尔兄弟。^[2] 马克思讽刺道，他们两人就像成双的犍牛，犁出的思想也一模一样。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接受末日审判的并不是遭受批判哲学批判的世界，而是批判哲学本身。

批判哲学已经走到了它的末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8页。

第十三章

批判哲学的灭亡

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了彻底批判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的“结语”中宣布：灭亡的不是批判哲学家所说的“世界”，而是批判哲学家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学总汇报》。

批判哲学应该走进历史了！

第十四章

《神圣家族》的理论意义及现实影响

在逐章节解读完《神圣家族》一书之后，有一个问题自然摆到了我们面前：这部正式出版已逾 170 年的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历史地位？今天重读该书又有怎样的意义？

对于上述问题，理论界同仁多年来做了有益的探讨，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和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为人们阅读和了解这本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颇有启迪意义。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阅读经典著述，需要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解读方式。对于一部晦涩难懂又涉及众多理论问题的哲学著作而言，更是如此。解读经典著作时，追求形成特定的共识和统一的定论，既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试图寻求文本的所谓客观原意，如同建造一座“巴比伦塔”，最终只能作鸟兽散。古今中外还没有一部经典著作的文本价值能够被宣称已被人们诠释完，并形成完全一致的所谓共识。任何文本只有在不断的解读中才会发现其中深藏的奥秘。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它经得起任何时代、任何立场、任何人物对它的阅读和解读。而经典文本也会随着不同时代人们对它的不同解读而不断迸发出新的价值。

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特定时代的读者在解读既定的历史文本时，一定会带着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即他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他那个时代的所谓“偏见”和“热情”，以及他个人知识的“先见结构”和“新的视界”。如此一来，当他的“视界”与作者的“视界”相“融合”时，当下“视界”的接受者对某一作品的理

解和感受会不同于之前历史中的接受者，也会不同于同时代的他者的解读，他将会用自己新的眼光，带着自己新的问题去接受它、理解它、评价它并重新创造它。正是历史中这种永不消失和永不重复的“现代视界”使理论创造和评价能够在无限的历史演绎中展开和丰富。

那么，如何看待《神圣家族》这部书呢？

前已述及，理论界对于《神圣家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神圣家族》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迪。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在阅读《神圣家族》一书，包括在阅读我们这部《〈神圣家族〉导读》时，不妨多了解一些理论家对该书已有的研究成果，借以丰富自己的理解视角，以便更全面更独特地把握《神圣家族》一书的理论价值。

为了不与已有的研究成果重复，我们仅想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对《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价值及其地位谈些看法：

其一，应该从《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几部年代相近的早期重要著作的逻辑关系中去把握《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我们基本认定，《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一部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中介著作。

其二，应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相关评述的逻辑演变来把握《神圣家族》一书所体现的理论价值和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与费尔巴哈思想具有密切关系，他们是在完成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之后才建立起唯物史观的。我们初步认定，在《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也是他们在唯物史观方面能够作出突出成就的根本原因。

一 《神圣家族》是理解《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键性中介著作

《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与马克思此前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以及后来与恩格斯二度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重要理论著作。这三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著作，其理论要旨可谓异曲同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反映了马克思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转变的清晰轨迹，尤其是从一个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者转向一个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的曲折过程，并一步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全貌。

当然，这些著作自然包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学界一般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语），第一次明确地从根本上对费尔巴哈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尤其是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概念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提了出来，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彻底告别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表明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已经形成。

对于学界这样的认识，我们基本是认可的。但是问题在于，在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他的新世界观（至少是雏形）难道就不存在吗？这种新世界观会不会在写其他著作时已经初步具备而只是没有公开宣布？

思想的形成和思想的公开具有不同的含义。就拿常人的思维来说，别人未必知晓某人所有的思想认识，他们只能了解此人已经公开陈述的思想。即在此人的某种认识公开宣称之后，他人就知晓了

此人的某种认识，但是别人怎么能断定在此之前这个人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呢？可能他的某种思想和认识早已形成，只是没有公开宣称和表达而已。因此，不能断定某种公开表述的思想就是当事人此时才形成的思想。公开表述自然是形成的标志，但没有公开表述并不意味着该思想在当事人的头脑中绝对没有形成。这就需要透过同期的其他著作来分析判断。

要知道，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的马克思刚刚写完《神圣家族》。我们的猜想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展示的思想在《神圣家族》中是不是已经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思想在《神圣家族》的字里行间有无相似的流露？退一步说，《神圣家族》即便没有具备或明确形成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但它对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思想的形成做了哪些思想铺垫和理论准备？我们形成一个初步的认定：如果没有《神圣家族》的存在，可能就没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存在。所以，应该关注《神圣家族》一书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必须理清《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脉络。

相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同期写成但没有及时出版的著作，无论就其文本结构，还是就其所表达的思想理论而言，理论界历来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与争论。尽管如此，学界一般也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系统阐述，即再次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清算，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全面创立。

对于学界的这种看法，我们也是基本赞同的。但问题是：此前不久才写成并出版的《神圣家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有哪

些影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理论在《神圣家族》中有无呈现?我们的看法是,彻底弄清《神圣家族》中思想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想的逻辑关联,是理解《神圣家族》理论地位和价值的重要环节,也是真正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关键。

尽管学界对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不尽一致,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并无根本性差异,而学界对于《巴黎手稿》评价的差异性则要大得多,很多判断甚至截然相反。问题似乎并不主要是对《巴黎手稿》文本的理解问题——虽然也存在,而主要是一个如何评价文本中所展示的思想问题。用哲学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析来说,对待《巴黎手稿》固然有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争论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即对文本“是什么”的解读固然是一个问题,有解读就会有差异,但更突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和定位这个“是什么”。因为,不同的评论会导致出现“不同的马克思”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巴黎手稿》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一直引起持续争论和关注的根本原因。

应该看到,《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前不久写的未完成手稿,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完《神圣家族》后接着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未完成稿是一样的情形。前后写成的著作当时都未曾发表,写成就发表的恰是这部作为中介的《神圣家族》。没有发表的被重新发现之后受到了热捧和关注,而早早发表的却被长期冷落和忽视。这种历史的诡异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把这前后三部著作连贯起来加以理解。况且,《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受到热捧的情形又存在着天壤之别。这表现在,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充满高声喝彩的情形相反,《巴黎手稿》或者被批为“是马克思还极不成熟的著作”,或者被誉为“是马克

思最精彩的著作”。

就因为中间这部《神圣家族》，前后两部著作或者被捧上天或者被摔到地，尤其是《巴黎手稿》。

那么，如何化解这一对立呢？

我们认为，透过《神圣家族》这个中介，把《巴黎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贯通理解，不仅可以较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发展脉络，而且能够很自然地理解对《巴黎手稿》所存在的截然相反的评价。因为，这三部著作不仅在形式上，更主要是在理论观点上具有层层递进的特征。

作为这三部书的中介，《神圣家族》这部书不管思想理论价值如何，至少在思想发展环节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这也许或是《神圣家族》这部书应该值得关注的最大的理论价值所在。

结合我们对《神圣家族》思想理论的把握，我们的初步看法是：《神圣家族》是马克思由《巴黎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研究范式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化过程中一部重要的中介性著作。再加上它是以论战为主而非以正面阐述为主的著作，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两种范式交错杂糅乃至彼此冲突此消彼长的思维和理论特征。至于对这两种研究范式本身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那就只好见仁见智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确认了《神圣家族》这种思想逻辑定位，并且能够理清该书所体现的思想理论观点，再将它与《巴黎手稿》中的思想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加以对比分析，就既能够较准确稳妥地对《巴黎手稿》的贡献乃至不足进行评价，也能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发展和理论成果有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理解。

二 《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和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一）《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前文指出,《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几部重要著作中关键的中介性著作,这显然不仅仅是从时间先后上说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些著作所展现出的思想逻辑脉络而谈的。这里的思想脉络固然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逻辑发展。但这种思想逻辑发展具体则体现为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是与他们对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等的认识态度的转变伴随在一起的。即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就是他们批判和清理上述思想家对他们思想的影响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清理和批判占据特殊地位。因为在这几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所不同的只是批判程度和批判侧重点的差异而已。而对于费尔巴哈哲学,只是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才开始了较彻底的批判。况且这两部著作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恩格斯在发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即《费尔巴哈论》)时作为书的附录收进去才第一次面世的。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公开出版就更晚了,甚至到目前连版本都没有统一的认识。

《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赞扬随处可见,如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

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1]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是非常欣赏费尔巴哈哲学的，把费尔巴哈看作“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圣家族》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依然充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特定理论武器，说明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依然是欣赏的，甚至是迷信的。就连马克思自己在这本书出版问世 22 年之后（1867 年 4 月 24 日），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也坦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2]即当初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费尔巴哈迷信的滑稽。

而恩格斯在其 1886 年所著的《费尔巴哈论》一书中也曾提到，他和马克思接触到费尔巴哈的“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后所感受到的思想解放作用。“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3]恩格斯还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4]

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有关《神圣家族》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论

[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2]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 年 4 月 2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93 页。

[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 页。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 页。

述中可以看出，写作《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写作《巴黎手稿》时的马克思一样，都还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哲学的色彩和痕迹，仍然“迷信”费尔巴哈，不仅“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且“强烈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同时与写作《巴黎手稿》时有所区别的是，《神圣家族》里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并且在写作该书时已经开始了“超出费尔巴哈”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

这就昭示了一种事实：写作《神圣家族》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依然对费尔巴哈哲学抱有迷信和欣赏，但是，他们对费尔巴哈的思想是有保留的，并非完全赞同，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和理论水平。也就是说，写作《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认识已经与写作《巴黎手稿》时的马克思不能同日而语了，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超越，更表现在他们对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而正是这种突破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地超越了费尔巴哈，即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费尔巴哈阶段”在《神圣家族》里开始了它的转型。

我们说《神圣家族》是一部重要的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中介著作，也主要是就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而言的。或者说，正是《神圣家族》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由他们的“费尔巴哈阶段”向后来的“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阶段”的转变过程。

现在我们就接着探索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我们初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有自觉的成分，也有不自觉的成分。他们虽然从整体上没有完全意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与不足，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其实已经明显超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水平。对此，他们是清楚的，恩格斯的论述也说明了

这一点。

只是由于《神圣家族》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因此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整体上并没有做过多的分析和研判，尤其是还没有顾得上去分析费尔巴哈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观点和主张。他们自身是自觉地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进一步用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而当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的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什么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连带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局限性，因为这一点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们还没顾上有意识地去意识它。

从马克思历次批判的思考与行文风格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只有当马克思感觉到要彻底清算和批判某种人和事时，他才会彻底地去分析和研判这种人和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如此，《巴黎手稿》如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此，《哲学的贫困》如此，《神圣家族》当然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写《神圣家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矛头针对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他们不仅没有想到要清算费尔巴哈，如同他们也没有想到清算蒲鲁东一样，而且他们还要利用费尔巴哈，如同他们要利用蒲鲁东一样。当然这种利用是真诚的，是出于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超越费尔巴哈时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交织状态，因此他们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总体上显得零碎和散乱，有些甚至只是一些朦胧的碎片化的思想火花。也许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完《神圣家族》回味写作的各个环节时，才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思想理论所达到的水准竟然比费尔巴哈的思想超出了一大截。或者说，当他们在体味自己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各个理论主张并且与费尔巴哈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时，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严重的

缺陷。原来他们所推崇、迷信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竟是如此的抽象空洞和如此的脱离实践，原来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主张本质上跟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是一种抽象的人性主张，等等。既然看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那么接下来的工作自然就是要开始清算这种哲学了。于是这就直接促成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二度合作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其实，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表达了要发展自己的理论观点并正面阐述他们有关现代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主张的打算。1844年底，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蒂纳出版了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准备把他们的打算具体化。他们要以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解体前的这一最新产物也是最后的成果进行批判的方式，来发展和阐述他们的新的世界观。

1845年2月，马克思被逐出法国，迁居到布鲁塞尔。同年4月，恩格斯也来到了布鲁塞尔。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这其中就包括马克思已经草拟完成的被恩格斯评价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经过充分商议和沟通，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共同全面创立他们的新世界观。这就促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的完成。

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了这事。他说，当1845年春他和也住在布鲁塞尔的恩格斯在一起讨论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社，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

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即经过了《神圣家族》的写作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式开始了他们正面阐述新世界观的理论创作工作。虽然这一理论创作成果未曾按时出版，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已经完成。马克思的第二次思想转变也由此完成。

我们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之所以能够得以实施并最终完成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做的理论铺垫和准备以及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是密不可分的。简言之，没有《神圣家族》就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就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这种新世界观的诞生。

可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部阐述新世界观的著作当时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可喜的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出的新结论紧接着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因此，我们认可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的相关论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的世界观的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首次对这一世界观的全面分析，《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首次在印刷物上对这一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的阐述。”^[2]

不过，我们还想在巴加图利亚这几句话的前面再加上一句话：《神圣家族》是对新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铺垫和准备。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2] [俄]巴加图利亚主编：《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序》，张俊翔编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神圣家族》的理论价值和地位由此可见。

（二）《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亦即《神圣家族》对《巴黎手稿》的超越以及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奠基作用，我们想再不厌其烦地概括地谈一下《神圣家族》一书对唯物史观的贡献以及它所达到的实际理论高度。

第一，《神圣家族》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因而批判和超越了唯心史观。这些思想原则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真理问题、道德问题、物质生产、群众史观等问题的阐明。

第二，《神圣家族》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因而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这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等问题的论述。

第三，《神圣家族》初步探索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问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劳动、价值、商品、私有财产等问题的初步论述以及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性的一般批评。

具体的理论贡献和相关阐述，读者可以在本导读的各个章节的论述中逐个把握，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上述《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能否说明，《神圣家族》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呢？这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神圣家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看待它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理论价值和地位。既不能人为贬低，也不能过分拔高。毕竟，作为一部正处于理论研究范式转

变过程中的过渡性著作,《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有着过渡期不可避免的特征。

第一,《神圣家族》对于唯物史观的阐述总体上还仅仅停留在表象层面,也就是说还没有深入到对社会历史具体矛盾关系的分析当中,仍然在用异化史观来分析社会变迁,在用人道主义来分析人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所提出的各个唯物史观的理论与主张还显得过于零碎和杂乱,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第二,《神圣家族》仍然没有完全跳出它所要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维范式,这具体表现在对于费尔巴哈的评价仍然不够全面,对于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倾向还没有发现,对费尔巴哈评价过高。

第三,《神圣家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还在用《巴黎手稿》当中的异化理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还没有探索出一套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这也妨碍了他们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入考察,因此也导致他们对于蒲鲁东的评价过高。

第四,《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唯物史观概念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读者将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判然相别。

这四点缺陷实际上是密切联系和彼此深刻影响的,这也是不能过高评价《神圣家族》的三个理论功绩的根本原因。当然,这里也涉及对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理论本身的成熟与否、适用与否及科学与否的价值评价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虽然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方面已经作出了诸多理论贡献,并以此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水平,但这种理论贡献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不能由此认定《神圣家族》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它只是为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

铺垫和准备。它还处在“费尔巴哈阶段”向“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阶段”的转型过程中。

三 | 重读《神圣家族》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还想简略地谈一下重读《神圣家族》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包括其他重要著作的基本动机和著述风格来说，重读《神圣家族》这部经典，至少会给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如下启迪。

（一）真正理解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意味着它始终是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和发展自身，以适应并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改变自身就意味着它不会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永不过时的永恒真理，而是面对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地通过批判来修订和补充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都是黑格尔的信徒，也都曾是费尔巴哈的坚定信仰者，然而，随着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实践以及他们思想认识的变化，他们敢于及时地不留情面地对这种已经过时的理论进行大胆地批判和抛弃，其实就是敢于大胆批判和抛弃自己头脑中已经过时的不适用的理论。也唯有这样大胆的批判和抛弃，才为他们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扫清了障碍，推动了他们思想的与时俱进。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体现这种发展历程的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的重要著述，可以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清理自己旧思想、旧理论的过程。这种清理不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却更加增添了这种理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当今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极其复杂多变的情形，许多新

问题新现象是老一辈思想家所没有遇到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寄希望于所有的问题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和经典思想、经典理论里找到答案，不仅是一种徒劳的懒惰行为，而且也是给马克思、恩格斯出难题，是为难他们。我们只有结合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分析新问题，抛弃旧观点，总结新理论，敢破敢立，才能真正应对时代的挑战，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落到实处，并真正体现这种理论品质。

（二）今天应该如何阅读经典

对经典的阅读从来都有两个基本路径：要么老老实实“回到经典文本”，要么“让经典来到当代”，中国古人称之为“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我们认为，对于经典，无论是“我注”还是“注我”，本质上差别并不大，因为这里的主体都是“我”，即毕竟是“我”在注六经，而不是他者在注六经；抑或六经注的是“我”而非他者。

我们主张依然要用解释学的方法来阅读经典，即在读经典时，时刻不要忘了阅读者当下的语境，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以及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把经典和活生生的当下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才会发现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只有如此解读，才能不断激发经典的新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迸发经典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因此，读经典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仿照卢卡奇的话就是：在读经典时，即便我们最终不得不抛弃经典里的思想和主张，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是一个经典的维护者和继承者，因为我们坚持了经典里的方法和原则。

比如，就阅读《神圣家族》来说，应该承认，《神圣家族》里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其他的重要论述，或者已经成为我们

的常识，或者还值得进一步的推敲，或者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或者带有明显的错误，等等。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的借鉴和学习，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对论战对象毫不留情穷追猛打的风格的由衷叫好，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那种对自己理论敢破敢立风格的高度赞赏。

所以说，读经典是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理论再造和意义重生的绝佳的机会。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多读一些经典呢？

《〈神圣家族〉导读》这部书，是由我和刘晓勇博士两人共同完成的。

该书基本结构是经我们两人多次讨论，由我最终确定的。在大体确定《神圣家族》一书各章节基本思想及其论述重点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如下写作分工，第一、第二、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及第十四章由我撰写，其中第八和第十一章，刘晓勇博士作了补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和第十章由刘晓勇博士撰写。在各自完成初稿之后，我们又彼此针对初稿进行了多次补充与修订。引文注释及校对工作由刘晓勇博士承担。全书最后由我统稿和定稿。

我们深知，解读这么一部晦涩难懂的著作对我们来说带有很大的挑战性。限于我们的理解和研究水平，也由于时间较紧的缘故，本导读一定还存在很多不妥和错谬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研究生曹睿、杜晨阳做了不少资料收集方面的繁琐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把这么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来完成，使我们获得了重温和学习马恩经典的宝贵机会，希望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感谢赵卜慧女士！

感谢胡百涛编辑！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特请各位前辈专家及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经典是民族的文化基因 经典是思想的源头活水

权威解读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思想精华与丰富内涵 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哲学思考

经典阅读有资政育人之功效。本套丛书力求从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层面，重点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全貌及其作品的深厚底蕴，以写作背景、成书过程和出版、全书结构、主要内容和观点及其历史影响和当代现实意义等为基础脉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原创性的权威解读和剖析，以使读者能系统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强化其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并分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上架建议 | 政治读物

ISBN 978-7-5162-1409-1



定价：28.00 元